



第四章 作為身體意象的胡狀

前 引

種族¹的外貌或體質特徵，在族群區分時是一個無法忽視的重要因素。認同是透過差異的標示而打造出來的，認同取決於差異。人群透過其「分類系統」（classificatory system）將差異原則運用在大眾身上，借用這種方式，至少就能根據人們的特性，將人們分成相對的兩個群體：我們／他們，自己／別人²。由於民族天生的審美觀或自我優越感，很容易對不同外貌的其他族群產生排斥感，甚至將之鄙夷為次等階級。在漢代的胡漢的族群區別中，種族外貌因素是否成為其中的一項重要指標？胡人的外貌是否不同於華夏民族的漢人？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問題。種族的「不同」，容易在族群相遇時產生一種「異類」的身體意象，而此種因身體差異所產生的「異類感」，又經常是族群在進行你我區別時重要的判別依據。所以胡人的種族體質特徵，就成為探討胡人意象時不能迴避的問題。

漢代的胡人至少涵蓋了匈奴及西域諸國的人民，西域人的形貌屬於深目、高鼻、多鬚應無太大的爭議。但匈奴人的外貌就引起學界極大的爭論。有學者認為匈奴屬蒙古人種，但也有學者認為匈奴人具有高加索種的特徵。目前的爭議在於漢代的文獻曾提及匈奴人的容貌不同於漢人，且漢代所遺留的畫像石圖案或人俑雕像，有相當多的胡人是深目高鼻多鬚的形象，魏晉時期的文獻更明顯提到匈奴人的外貌是深目高鼻。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境內挖掘出來的所謂「匈奴墓」，都未見有高加索種的人骨遺骸。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文獻與考古之間存在著極大的歧異，因此作為漢代胡人主體的匈奴人種問題便遲遲未能有一致的共識。目前這個問題存在著幾種可能性，一是匈奴人的容貌與漢人無大差異，漢代藝術品中胡人高鼻多鬚的形象，是為了增加族群的異類感而被刻意強調出來的，而且魏

¹ 本文所指的「種族」，係偏重於以體質型態或外在遺傳特徵為主的「身體定義法」，參胡台屏：《種族理論之研究——兼論蘇聯境內猶太人》，《蘇俄問題研究》第22卷1期（1981年，台北），頁23，即強調的是「人種」上之差別意義。

²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 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頁40-41。

晉文獻中的高鼻深目匈奴人很可能不是來自匈奴本部而是來自西域，中國境內的所謂「匈奴墓」其墓主的確是匈奴。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匈奴人的確具有某種程度的高加索種特徵，只是漢代人並沒有刻意在文獻上留下記錄。而內蒙古地區所發現的所謂「匈奴墓」，其族屬判定應持審慎態度，不能排除是其他的早期游牧人，如貊人、林胡或樓煩等非匈奴主體的其他北方民族所遺留。

第一節 被建構出來的胡狀——對他者的異類化與怪誕化

在前章我們已經探討過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形象，總的來看，漢代藝術中所表現的胡人大多具有深目、高鼻、高顴、多鬚的特徵。但目前大陸地區的考古發掘成果，並未在河西走廊及內蒙古地區的墓葬中發現高加索種人的遺骸。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漢代的藝術中的胡人形象，可能與現實中的胡人外貌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若作為胡人主體的匈奴人與漢人同屬蒙古人種，那為何漢代人要將胡人特別的塑造成一種非我族類的異類形象？而為何魏晉時期史料中的匈奴又會被記載為具有深目、高鼻、多鬚的外貌？這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點。

4-1-1 實像與虛像的爭議

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若胡人與漢人之間的種族差異不大，為何漢代藝術中的胡人會是一種異類的形象？造成這種圖像與文獻矛盾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胡人的構成分子在漢代長達四百年的歷史過程中已逐漸有所變化，東漢中期以後西域人的湧入中國，使漢人心目中的胡人的主體，從原本的匈奴人逐漸轉移至西域人（詳前章）。二是邢義田先生所提出的工匠「格套」傳統。工匠們依循本身職業的傳統，和民眾的心理需求，去塑造一個刻板的形象¹。第三是心理需求及優勢族群意識型態的成分，漢人透過形貌奇特的胡人造型來滿足本身的「異族想像」，強化胡人作為一個「他者」的刻板形象，可從中獲得一種族群優越感，也符合了漢人所預設之胡漢關係中「上下」、「主從」形式的二分機制。本節擬從第三點來觀察這種現象。

人類族群意識的生成，經常是透過來自異民族的刺激，並藉由劃定他者（其

¹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頁70-71。

他族群)來凸顯我族的存在。而將他者刻板化、並賦予符號的象徵意義,是我們觀察漢代的胡人形象藝術時一個值得切入的面向。借用符號的聯想,不管是在他者的文化傳統找尋「自我」的符號,或者在「自我」的文化體系區隔特定族群,「我」皆來自於他者的網絡,自我往往是相對於他者而來²。因此,給予作為異族的他者一個刻板印象(stereotype),在接觸異族之初時的確能滿足一般人對異類族群的一種心理想像。

必須承認,迄目前為止,在中國境內的先秦至秦漢考古發現中,除了新疆地區外,並未發現有高加索種人的遺骸出土。在內蒙古的漢代考古遺址中(圖1)³,也有典型蒙古人種類型的圖像出現,這說明在漢代胡人活動的區域中,也存有蒙古人種胡人的活動⁴。由於漢代的文獻並未有明文提及胡人的外貌是「高鼻深目」,僅言及面貌有所不同(詳下節),因此漢代胡人的所指範圍也可能包含蒙古人種的族群。



² 陳正芳：想像的美國與再現本土——以西班牙的《歡迎，馬歇爾先生！》與臺灣的《太平天國》為例，《中外文學》第32卷第11期（2004年，台北），頁39、47。

³ 魏堅編著：《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169、彩圖三。

⁴ 雖然這些圖像有可能是屬於鮮卑族，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從漢代開始，內蒙古長城地帶的人種地理發生較大的改變，主要是增加了一種新的種族類型，即西伯利亞（北亞）人種類型，鮮卑族可能屬於此型。但朱泓認為此種外來人種因素係來自於北匈奴，參氏著：內蒙古長城地帶的古代種族，收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邊疆考古研究》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307-309。



圖 1 內蒙古鳳凰山墓葬 M1 壁畫

摘自 魏 堅 編著：《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頁 169（下）彩圖三（上）

4-1-2 他者形象的「異類化」

將外族人異類化，尤其是特別強調形貌上的怪異，在《山海經》一書中已有明顯的表現⁵。作為他者的胡人，很容易被刻意塑造成與漢人截然不同的異類，來加深、並確認彼此之間所存在的族群差異。周寧先生在研究晚清時期的西方中國形象時曾指出：

中國人是事事顛倒的另類，是西方人的徹底的“他者”，一切都荒唐可笑又不可思議。中國人似乎成為永遠不可能被認識的另類，另類化或異類化中國人的形象，其文化功能不是拉近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距離，而是加大這種距離並確定這種距離；不是認識現實中的中國人，而是使現實中的中國人出現在非現實的、怪誕的形象中，賦予中國人以某種不可理喻性，從而拒絕理解中國人。中國人並不僅野蠻，而且荒誕。在二元對立原則下，中國人成為西方人的“他者”形象和東方人的代表，處處與西方對立。確定中國人的“另類角色”，不僅為西方文明排斥與征服中國文明或東方文明提供了社會意識根據，也從中認同了西方文明的優越性。東西對立的等級化的種族主義世界秩序便確立並認同了。中國人屬於荒唐可笑的另類，在二元對立原則下確立中國人的“他者”形

⁵ 伊藤清司：異形の民——『山海經』の對周邊民族觀——，收中國古代史研究會 編：《中國古代史研究 第六》（東京：研文出版，1989 年），頁 42-62。中譯文收錄於張正軍譯：《中國古代文化與日本》（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502-517。

象，使西方人獲得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種族權力與自由。⁶

依據周寧先生研究的啟發，我們可以發現，當我們在面對不同族群時，很容易將對方當成「他者」，而「他者」在我們自身的文化體系中是有某種積極意義的。將他者醜類化、荒謬化，加強其異類感，能符合漢人對胡人野蠻、落後、不可理喻的既有種族偏見（詳下章），漢人不需要太過於去瞭解他們。胡人的存在，凸顯了漢人或漢帝國的文明性與優越性，也符合自先秦時期便已成形的天下秩序，華夏文明是進步而優越的，位於邊遠「荒服」之地的蠻夷不僅文化落後，還容貌粗鄙。胡人「高鼻、深目、多鬚」的怪異容貌，正好滿足漢人本身民族與文化的優越感，尤其漢匈戰爭的最後勝利，更強化了此種「優勝劣敗」的征服者意識型態，漢人可以維持原先的種族優越感，而不必再對胡人卑躬屈膝，「漢高胡卑」的心態不再需因軍事上的挫折而有所調整。故將胡人的容貌異類化，在漢代的社會中應有相當積極的功能存在。特別是強調其多鬚、多毛的體態特徵，在中國社會有其特殊的意涵。在中國的種族觀念中，頭髮卻是決定種族差異的一個生理特徵，尤其厚重的毛髮，是被認為具有野獸的特徵⁷，正可凸顯胡人或夷狄在漢人論述中一向被強調的獸性。

4-1-3 後殖民主義的觀察點

後殖民主義學者的某些觀點，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漢人為何要將胡人異類化。殖民主義是某種再現暴力下的「文化」或「自我」的建構，是對「異己性」（otherness）的挪用與刻板化。殖民者的書寫，不管是由傳教士、商人或民族志學者所帶來，總是力量的賦予（empowering）和一種塗改（corrupting），其記述必定引含某種

⁶ 周寧 編著：《第二人類（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95-98。

⁷ 馮 客（Frank Dikötter）著、楊立華 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26、127；又氏著：“Hairy Barbarians, furry Primates, and Wild Men: Medical Scienc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Hair in China”, in Alf Hiltebeitel & Barbara D. Miller ed., *Hair: Its Power and Meaning in Asian Cultur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pp. 51-74

預設⁸。A.Memmi 指出：對於所有殖民者來說，總是需要一個被殖民者的形象——懶惰、野蠻、非人特質，以合理化殖民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並使整個系統的運作順暢。在殖民體制的剝削、掠奪特性下，西方的想像、欲望馳騁於異己的軀體上，差異變成是低高的層級，善惡美醜的二分機制⁹。

漢代的胡漢關係雖非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但匈奴的降漢，以及伴之而來的胡人內徙，漢人以戰勝者之姿凌駕於胡人之上，胡人被迫從事低下的工作而長期處於漢代社會的底層（詳後章）。因此胡人作為一個被統治者，在漢帝國境內之境遇在某種程度而言，也與被殖民有些類似。故而漢人在描繪胡人時，可能已存有一種戰勝者立場之預設，強調被征服者的異己性，並將其刻板化，一方面符合漢人對異種的異族想像，另一方面也再次合理化胡、漢之間高低、美醜的階層差距，此種簡單化的二分機制，也是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典型表現。

4-1-4 對於他者的恐懼感與優越感

另外，漢匈之間的長期抗爭雖然漢朝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但胡人勢力的一度強大，的確給予漢人相當程度的心理壓力。胡人雖然文化落後，卻仍能在軍事上威脅漢朝，漢人也不能無視於他們在軍事上的強勢表現。周寧先生的研究指出：

中國人形象出現在西方，起初對西方文化秩序帶來了一定的困惑與恐慌。它威嚇或擾亂了西方人既定的世界秩序。中國人是非西方人，作為異教徒的中國人也可能道德高尚，超越二元對立原則的中國人的形象一直令西方文化不安，惟一的安全方式是在理智上完全拒絕它，誇大其可笑性，使人感覺到那裡發生的一切都是不可理喻、截然相反的，漫畫化與丑化的中國人的形象，不僅意味著距離，還意味著等級；不僅意味著知識，還意味著權力；不僅意味著西方人的優越感與輕蔑，還意味著西方人的恐懼與焦慮。中國人的形象是可笑

⁸ 莊雅仲：再現、改宗與殖民抗爭，收盧建榮 主編：《文化與權力》（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頁 33 註 4。

⁹ 莊雅仲：稗海紀遊——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收盧建榮 主編：《文化與權力》（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頁 51。

的、醜陋的。這種中國人的形象可以讓西方人感到輕鬆與優勝。中國人的形象被漫畫化、丑化，固定為集體想像中的某種“原型”，原型是簡化了的、由最基本的幾點特徵要素構成的形象符碼，在社會中普遍流傳。沒有人去追究其合理性，似乎它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的，儘管其中虛構遊戲的成份明顯多於知識。對於西方人來說，此時重要的不是認識現實的中國人，而是為在知識與實踐中把握中國人提供一個原型。有了這個原型形象，中國人就成為確定的、可駕馭的他者。西方人是健康的、合理的、正常的、進步的，中國人是怪誕的、荒謬的、不可理喻的、墮落的。確立了優劣正謬關係，也就注定了西方人統治甚至消滅中國人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他者也具有潛在的威脅，甚至會顯得強大有力。異類形象中發現怪誕、愚蠢、笨拙甚至醜陋，等等可笑之處，都可以在自我心理中獲得一種突然的榮耀感與優越感。¹⁰

經由對照近代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創造過程，可以想見漢人應也是用一種與看待自己的親朋近鄰不同的目光來審視這些異族人的，這種目光中充滿了神秘、好奇、仰慕、敬畏、同時還有文化差異造成的自我優越感，以及戰爭所帶來的憎惡與敵意¹¹。對陌生人的恐懼是種族中心主義癥結的一個主要來源，與生理上不同的民族交往，可使得排斥的態度被極大地增強¹²。故看來極端異類的胡人形象，可能是漢代文化的構成物，也是漢人確立世界秩序、認同自身的方式。突顯出他者的異類性與怪誕性，既是認識他者、認同自我的方式，也是排斥他者、保護自我的方式。故漢代藝術圖像中的胡人，可以不是真實世界中的胡人，只要其能符合漢代民眾對胡人的心理形象需求，圖像造型與真實形象上的差異便會被忽略，甚至視為理所當然。要解釋漢代胡人「高鼻、深目、多鬚」造型的流行，像是因種族優越感而帶來的異族想像，以及類似殖民主義者的勝利者合理統治心態，都是我們在觀察胡人圖像時值得考慮的解釋面向。

¹⁰ 周寧 編著：《第二人類（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❶）》，頁 98-111。

¹¹ 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46。

¹² 馮客（Frank Dikötter）著，楊立華 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頁 49、54。

對於胡人「高鼻」的特徵，似也可以從漢代人的體貌觀來觀察。漢代有相人術的風氣，其中鼻高挺、口大者為上相¹³，而且大鼻或高鼻更是強悍的特徵¹⁴，因此胡人的高鼻特徵，是否因其強悍的民族性而特別受到工匠的加強描繪，也是圖像解釋的另一種可能性。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點，是魏晉文獻上被記載為深目、高鼻、多鬚的胡人，是否為匈奴人的問題。以往持匈奴白種說的學者，其所據之史料主要為《晉書》中的以下兩段記載：

《晉書·石季龍載記上》：「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¹⁵

《晉書·石季龍載記下》：「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門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¹⁶

以上兩條史料所指者多為羯族，最早注意到胡羯有高鼻多鬚特徵的應是夏曾佑¹⁷，王國維繼之在《西胡續考》¹⁸一文中，進一步據此論證匈奴人為高鼻多鬚。而羯族為一來自西域之部落，學界目前已無大爭議，史家們至今大多承認羯族具有高加索種特徵¹⁹，故據此而論匈奴人之形貌，恐有以羯為匈奴之危險，想要證

¹³ 祝平一：《漢代的相人術》（台北：學生書局，年 1990），頁 181。

¹⁴ 彭衛：《漢代的體貌觀念及其政治文化意義》，收氏著：《漢代社會風尚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頁 115。

¹⁵ 《晉書·石季龍載記上》，頁 2776。

¹⁶ 《晉書·石季龍載記下》，頁 2792。

¹⁷ 夏曾佑在 1904 年云：「案此則胡羯之狀為高鼻多鬚而深目，此狀頗類今亞洲西境諸族人而非匈奴種也。」氏著：《中國古代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3 年），頁 428。

¹⁸ 文收《觀堂集林下》（台北：世界書局，1983 年），頁 616-620。

¹⁹ 陳寅恪著、萬繩楠整理：《五胡種族問題》，《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 年），頁 97-100。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78 年），頁 414-427。譚其驤：《羯考》，《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24-233。黃永年：「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唐代史事考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頁 187-200；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歷史教學》1980 年 10 期，頁 45-48；雷

明匈奴之形貌與漢人不同，似應從其他史料再入手（詳下節）。而南匈奴劉淵一系所出之屠各種，有學者亦疑其實為西域種²⁰，故漢代做為胡人主體的匈奴人之種族，其問題仍存爭議。漢代藝術中那些高鼻深目的胡人，恐有不少是來自西域的民族，但匈奴人是否就全與蒙古種之漢人在外貌上無異？文獻上所反應的似不盡是如此，這是我們在下節要討論的重點。

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人文分冊》第5卷第1期（1994年，嘉義），頁173-235。

²⁰ 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頁173-235；雷家驥：試論「五胡」及其君長的漢化思考，「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主辦，2003年12月12、13日），頁9、30、49。關於屠各胡的種屬問題，目前尚未有定論，相關討論見內田吟風：南匈奴に關する研究，收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88年），頁201-365；唐長孺：魏晉雜胡考，收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頁382-403；周偉洲：《漢趙國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9-25；周偉洲：試論魏晉時期與匈奴有關的諸胡，文收馬大正等編：《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58-365；片桐功：屠各胡考——劉淵舉兵前史，《東洋史研究報告》第13號（1988年，名古屋大學），頁1-30。

第二節 文獻上的胡狀問題

前節曾經提過，漢代胡人的面貌也許並非與漢人有截然不同的差異，只是漢人爲了滿足其異族想像，進而刻意凸顯、甚至虛構了胡人高鼻深目的特徵。這個問題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在西漢時期，漢代語境中的胡人絕大部分是指匈奴人，而匈奴人未必有明顯高鼻深目的特徵。然而從西漢中期至東漢中期，中亞人已頻繁地往來於中國，從東漢後期開始，更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中亞人來華熱潮，其中有佛教僧徒、商賈、貴族、遊客。他們大多在中國各地定居，從而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¹。因此東漢時期大量出現的那種高鼻深目，頭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可能不是虛構，而是寫實的西域胡人的形象。第二，雖說匈奴人未必高鼻深目，且漢代文獻也未提及其有高鼻深目的特徵，但在漢代的文獻中確有胡人相貌不同於漢人的記載，雖然這種不同未必是人種間的差異，但仍可能暗示匈奴人在外貌上的確與漢人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究係到何種程度？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面向。

4-2-1 漢代文獻上所見的「胡狀」描述

在不同族群接觸之初，往往先注意到外貌的特徵與服飾等物質文明的差異²。在族群的你我識別中，「以貌取人」也是最直接、簡單的方式。漢代的確也有以貌論人的風氣，在漢末以至魏晉，品評人物即甚重儀容，形貌、言語、舉止皆在品評之列，甚至有不少留意膚色的記載。據邢義田先生的研究，秦漢時代記述膚色除「黑」、「白」之外，還有「青赤」、「黃」、「赤」、「析（皙）」、「青白」等，漢代人相信形貌與賢愚有關³。

¹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收氏著：《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46。

² 劉苑如：〈從鮮卑敘記看南朝志怪中異族想像與時代感覺〉，《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第20期（2002年，台北），頁258。

³ 邢義田：〈論漢代的以貌舉人〉，收宋文薰等編：《考古與歷史文化（下）》（台北：正中書局，1991年），頁255-264。

在漢代的文獻中，曾經對莎車、康居、罽賓與烏孫等西域胡人的容貌特徵留下記載。繁欽的《三胡賦》云：

莎車之胡，黃目深睛，員額狹頤。康居之胡，焦頭折頤，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無餘肉。面象炙蜎，頂如持囊，隈目赤眚，洞頤印鼻，額似鼪皮，色象萎橘。⁴

又《易林 卷六·噬嗑之第二十一·萃》云：

烏孫氏女，深目黑色，嗜欲不同，過時無偶。⁵

由《三胡賦》及《易林》的記載，不難看出其中已描繪出胡人某種程度的高加索種特徵，至於所謂的「深目黑醜」，應指歐洲人種中的“南方人種”，即印度—地中海型，其特點是膚色黝黑，髮色深，此人種在今日的南歐、北非、阿拉伯半島、南伊朗、北印度都有分布⁶。但我們也可同時發現，在漢代的審美眼光中，似對高加索種體質特徵持鄙夷的態度，甚至連與之婚配都興趣不高。即使雙方結合，似亦得不到丈夫之青睞。《易林》中的記載曾透露出此類訊息：

《易林 卷二·需之第五·恆》：「螭螺生子，深目黑醜，雖飾相就，眾人莫取。」⁷

《易林 卷五·觀之第二十·無妄》：「螭螺生子，深目黑醜，雖或相就，眾人莫取。」⁸

⁴ 費振剛 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642。

⁵ 《易林 卷六·噬嗑之第二十一·萃》，頁 139。

⁶ 徐文堪：〈從漢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種問題〉，收王炳華 編：《新疆古屍——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02。另參楊希枚：〈論漢簡及其他文漢獻所載的黑色人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 本第 1 分（1969 年，台北），頁 309-324。後收入張春樹：《漢代邊疆史論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7 年，頁 200-221。拙作：〈月氏的名稱、族屬以及漢代西陲的黑色人問題〉《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 1 號（1993 年，台北），頁 111-143。

⁷ 《易林 卷二·需之第五·恆》，頁 38。

⁸ 《易林 卷五·觀之第二十·無妄》，頁 130。

《易林 卷九·遯之第三十三·剝》：「蝸螺生子，深目黑醜，似類其母，雖或相就，眾人莫取。」⁹

《易林 卷六·復之第二十四·蒙》：「鴟鵂娶婦，深目窈身，折腰不媚，與伯相背。」¹⁰

文中蝸螺、鴟鵂之族類雖不詳，但其體質特徵與前述的烏孫相同，皆為深目黑色之狀。此種黑膚色之胡人在魏晉南北朝亦有所見。

《南史·鄧琬傳附劉胡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¹¹

可見在南北朝時期，黝黑的膚色似乎也是胡狀的一項體質特徵。又三國時代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張飛，其貌相亦似黑膚或多鬚。唐代詩人李商隱《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有關詩中之「胡」字，《辭海》¹²及《漢語大字典》¹³釋作「黑」，《漢語大詞典》¹⁴釋作「鬚鬚」。劉學鍇與余恕誠認為：「《南史》謂其面色黝黑似胡人，未謂『胡』即『黝黑』之義。「胡」即『鬚』，俗謂『大鬚子』。《鈞天》箋引裴庭裕《東觀奏記》『胡而長』之『胡』同此，可證。」¹⁵張飛之長相疑有異於一般蒙古人種的特徵，即多鬚或膚黑等疑似「胡狀」的外貌，故成為被戲謔的對象。

雖然漢代的文獻中並未對匈奴人的形貌留下任何具體的描述，但以下兩個文獻仍描述了胡人的容貌是與漢人有異的。首先是東漢人王言壽的〈魯靈光殿賦〉云：

⁹ 《易林 卷九·遯之第三十三·剝》，頁 219。

¹⁰ 《易林 卷六·復之第二十四·蒙》，頁 153。

¹¹ 《南史·鄧琬傳附劉胡傳》，頁 1028。

¹² 《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版縮印本），1997 年，頁 1698。

¹³ 《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 年縮印本），頁 862。

¹⁴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年 1997 縮印本），頁 3892。

¹⁵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集解》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867。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佻欺僇以鵠眈，鵠鵠而睽睽。狀若悲愁於危處，慄慄蹙蹙而含悴。」¹⁶

其中「鵠鵠」李善注：“大首深目貌”¹⁷。可看出至少東漢時的胡人是有「深目」特徵的。至於西漢時期的胡人，似亦有特殊的容貌。賈誼《新書 卷四·匈奴》云：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還慈母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¹⁸

從這條史料¹⁹不難推測出胡人（在西漢幾乎等同於匈奴）的面貌應有別於漢人，而且當時對於匈奴人之胡貌可能普遍持負面的審美評價，故賈誼才會建議文帝以「母不嫌子醜」的心態，用懷柔的手段來對待面貌不甚為漢人所欣賞的胡人。從漢代留下的雕塑人俑來看（如陽陵的兵馬俑），漢代漢人的面形似較今日的華北人更為寬大扁平，倘匈奴屬於蒙古人種中的北亞類型，那麼兩者間在外貌上所顯現出來的差異不見得很大。但倘若這是不同人種間的差異，則很容易被識別而顯現出來。目前假設這人種上的差異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另一則是蒙古人種與尼格羅種。就目前考古與文獻上的材料來看，在北方草原地帶似未發現有尼格羅種人活動過的跡象，凌純聲曾研究過中國史志上的小黑人，其分佈均在中國境內的南部或域外東方²⁰，並不在華北的草原地帶。另一可能性則是前面提及的黑膚人，但縱令其膚色為黑，但仍屬高加索人種。那麼假使這種面部差異是來自於人種的話，那只能有一種可能性，即是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之類的差異，但即使如此，仍不代表匈奴人是純粹的高加索種人。

¹⁶ 費正剛 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528-529。

¹⁷ 張啟成、徐達 譯注：《漢賦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75。

¹⁸ 《新書 卷四·匈奴》，頁135。

¹⁹ 最早注意到此條能反映胡人面貌史料的是日人內田吟風，參氏著：〈漢賈誼『新書匈奴篇』譯解〉，收 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記念事業會 編：《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學論集》（京都：朋友書店，1979年），頁276。

²⁰ 凌純聲：〈中國史志上的小黑人〉，收氏著：《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 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頁345-361。

除此之外，尚有一史料也可推測胡人的面貌與當時的漢人有異：

《風俗通義·佚文·服妖》：「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姦此馬以生子。」²¹

馬能與人產子，自屬荒誕不經。「蒼頭」為漢代的一種家奴²²，為著蒼巾執賤役者²³，個人推測可能是養馬胡奴與婢女私通產子，為逃避主人懲罰，故乃謊稱此嬰兒為馬匹所生。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為何當時人會認得出此嬰兒為「胡子」，除了嬰孩的相貌明顯與漢人有異外，似無其他合理之解釋。從另一方面來看，將此事列入「服妖」也值得注意。歷代正史的〈五行志〉中也有將國家衰亡與社會動亂，歸因於君王或百姓流行的奇裝異服，稱之為「服妖」²⁴，故是否也暗示胡人的外貌在當時的確是被歸類於怪誕之列。而胡人竟能與馬交媾，也側面反映了漢人對胡人的歧視，甚至有醜化他者的意味²⁵。

另成書於魏晉時期之《後漢書》，也有胡人形貌是可鑑別的記載：

《後漢書 五行志》：「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²⁶

伊藤清司在研究過《山海經》的周邊民族觀後曾指出：漢族多從形體上來認識周邊民族，特別是《淮南子·墜形訓》與《山海經·海外四經》中所顯示的異民族觀，不是著重指出文化上的異同，而是立足於體貌上的不同²⁷，因此漢人會

²¹ 《風俗通義·佚文·服妖》，頁 572。

²² 志田不動磨，傅衣凌 譯：〈漢代蒼頭考〉，《食貨半月刊》第 4 卷第 11 期（1936 年），頁 37-41；李解民：〈民和黔首〉，《文史》第 23 期（1985 年，北京），頁 55-72。但蒼頭也另指軍隊中之精銳者，參邢義田：〈論漢代的以貌舉人〉，收 宋文薰 等編：《考古與歷史文化》（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頁 260。

²³ 邢義田：〈論漢代的以貌舉人〉，頁 259。

²⁴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台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94。

²⁵ 此點承戴晉新教授提示，特申謝忱。

²⁶ 《後漢書·五行志》，頁 3299。

²⁷ 伊藤清司：〈異形の民——『山海經』の對周邊民族觀——〉，收中國古代史研究會 編：《中

注意到胡人與漢人在形貌上的不同應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山海經》的成書年代向來存有爭議²⁸，但其書至遲完成於漢代已無大爭議，因此《山海經》中強調異民族的體貌特徵，應多少反應出漢代在區分族群時某些強調的重點。事實上春秋至漢代出現或流行的其他文獻，如《逸周書·王會》、《淮南子·形墜》，以及史書中的四裔傳等等，都有強調他族的「異質性」的現象，以強化異質邊緣的辦法，來強調華夏之間的同質性與增進彼此的凝聚，即藉由刻劃「邊緣」來達成凝聚「中國」的功能²⁹。

類似以胡人面貌為怪的心態似繼續延續至魏晉時期：

《抱朴子內篇 卷十七·登涉》：「抱朴子曰：『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³⁰

葛洪生活的年代去漢未遠（公元 283-363）³¹，在此胡人被目為精怪，可側面看出在當時人的眼光中，胡人之面貌當屬於怪異一類。

4-2-2 有關匈奴人種的默證問題

以往學界因漢代史料中並未特別點出匈奴人之體貌異於漢人，因此很容易令學者運用默證來得出匈奴的相貌與漢人無異的結論。譬如陳寅恪就曾認為：

國古代史研究 第六》（東京：研文出版，1989 年），頁 42-62。中譯文收錄於張正軍譯：《中國古代文化與日本》（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502-517。

²⁸ 如蒙文通認為《山海經》的寫作年代不能晚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見氏著：〈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 1 輯（1962 年），頁 58。袁珂則認為成書於戰國中期至漢初，見氏著：〈《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7 輯（1978 年，上海），頁 147-171。袁行霈亦認為《山海經》成書於戰國至漢初，在哀帝時經劉秀校定、刪汰，見氏著：〈《山海經》初探〉，《中華文史論叢》1979 年第 3 輯（上海），頁 7-13。

²⁹ 王明珂：〈漢人形成：漢代中國人的邊疆民族意象〉、〈結語 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收氏著：《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 年），頁 317-318、412。

³⁰ 《抱朴子內篇 卷十七·登涉》，頁 304。

³¹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序言〉頁 3。

「王國維氏謂“匈奴人高鼻深目”，亦非。蓋漢司馬遷班固作《史記》《漢書》時，必獲見匈奴，乃竟無一語及此；而祇言烏孫以西人高鼻多鬚（案：應為大宛以西之誤），對匈奴非高鼻深目可知。更證以霍去病墓中掘出匈奴石像，僅兩顴甚高，益信匈奴非高鼻深目矣。」³²

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³³。事實上王仲孚先生曾指出：「凡是某一時代的著作中，未曾記載的事，就是歷史上未曾發生的事」這種默證的運用，在運用上必須非常謹慎³⁴。一般人常有「倘若一假定之事實，果真有之，則必當有紀之之文籍存在」的直覺邏輯，其實在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³⁵。

從《史記》同一條史料的記載，亦可看出此種默證之薄弱。《史記·大宛列傳》云：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

³⁶

若依類似默證之原則，司馬遷既僅言大宛以西為深目多鬚之類，故大宛以東應為蒙古人種。但事實上無論是塔里木盆地的綠洲諸國，或是伊犁河流域的烏孫，當時皆在大宛以東之列，然而這些地區目前的體質人類學考古材料已表明高加索種才是此地區的主要人種類型³⁷，且前引繁欽之《三胡賦》也已指出塔里木盆地南緣之莎車胡為「黃目深睛」之類。至於霍去病墓所發現的匈奴石雕，雖然

³²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收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11。

³³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收顧頡剛編：《古史辨 第二冊》（台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271-272。

³⁴ 王仲孚師：〈顧頡剛的古史研究與著述〉，收錄《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1996年），頁669。

³⁵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頁272。

³⁶ 《史記·大宛列傳》，頁3174。

³⁷ 韓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收氏著：《絲綢之路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32。（原刊《西域研究》1991年2期，頁1-13。）

兩顴甚高，但也不必然代表其為典型的蒙古人種。在突厥系民族中，也有高鼻深目與高顴兩種性狀並存的情況（詳下節），故陳寅恪之默證推論其實值得商榷。

至於為何漢代史籍甚少提及胡人的體質容貌特徵。邢義田先生認為可能有以下的幾點原因：第一，這些外族在體質特徵上可能和蒙古種的中國人並沒有值得一提的差別。另一個原因是傳統士人深受孔子「披髮左衽」一語的影響，將注意力集中在髮式和衣式等較具文化意義的特徵上。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於深具文化優越感的中國士人對異文化缺乏真正的興趣和好奇³⁸。不論其真實的原因為何，“言有易，言無難”³⁹，實際上凡史料不足以肯定一事時，應該說也就不足以否定之。以事物的不整齊劃一和文獻記載中某些表面的相互矛盾而斷定古事的「不有」，對史學的傷害恐怕也未必就比「以不知為不有」更小⁴⁰。兩漢史料雖未記載匈奴人與漢人有異，並不同於即證明匈奴人外貌與漢人相同，我們不應排除胡人與漢人在外貌有異的可能性。

4-2-3 魏晉以後有關胡人容貌的描述

與漢代的文獻相反，去漢未遠的魏晉時期卻有不少胡人形貌的記載。雖然魏晉時期的胡人已包含了許多來自中亞的西域胡成分，但西域胡與匈奴胡在這些魏晉文獻中還是經常不分，不過胡人深目高鼻之特徵已明書於史籍，如：

《北史·恩倖傳》：「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⁴¹

《晉書·佛圖澄傳》：「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

³⁸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頁23-24。

³⁹ 此為王力語，參葛劍雄、周筱贊：《歷史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69。

⁴⁰ 羅志田：〈先秦的五服制與古代的天下中國觀〉，收氏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4。

⁴¹ 《北齊書·恩倖傳》，頁694。

肘。』」澄曰：『此即曜也。（按：即劉曜）。』」⁴²

《晉書·石季龍載記上》：「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⁴³

《晉書·石季龍載記下》：「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門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⁴⁴

此段以胡羯並稱，可再對照《魏書·羯胡石勒傳》：

閔知胡人不為己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⁴⁵

這兩段史料說明了當時深目、高鼻、多鬚者常被誤作胡人而慘遭殺害，且所謂的五胡，可能是「五部胡」之義，而未包括鮮卑、氐、羌，可見氐、羌與胡人確是涇渭分明的不同種族⁴⁶。且由「最胡狀」這個用詞，可知當時胡狀有深淺之別，當為高鼻深目多鬚之程度。呂思勉嘗引《晉書·呂纂載記》云：

「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蓋時俗以胡形相詬病，故以此相忌，此石宣所以一怒而誅崔約。」⁴⁷

此項資料透露出兩項訊息：一是胡人頭部面貌的確有異於漢人；二是胡人在當時曾被習稱為「胡奴」。

⁴² 《晉書·佛圖澄傳》，頁 2486。

⁴³ 《晉書·石季龍載記上》，頁 2776。

⁴⁴ 《晉書·石季龍載記下》，頁 2792。

⁴⁵ 《魏書·羯胡石勒傳》，頁 2054。

⁴⁶ 孫仲匯：〈五胡考釋〉，《社會科學戰線》1985 年 1 期，頁 141-143。

⁴⁷ 呂思勉：〈胡考〉，收錄於 林幹 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38。

此外，作為魏晉時期雜胡之一的「稽胡」⁴⁸，《元和郡縣志》卷四《丹州》引《隋圖經》謂義川縣的稽胡人是「胡頭漢舌，其狀是胡，其言習中夏」⁴⁹。從「胡頭」、「胡狀」等用語，可以明顯看出胡人的面貌，的確與漢人不同。雖然學界對於稽胡（山胡）族源的看法頗為紛歧，然不論是主「匈奴後裔說」⁵⁰、「狄裔說」⁵¹、「雜胡說」⁵²、「土著說」⁵³或「突厥語族說」⁵⁴，上述的人種多屬突厥⁵⁵及西域系統，均混有不同程度的高加索種血液，故其外貌高鼻多鬚而明顯與漢

⁴⁸ 其分佈地域可參見嚴耕望：〈佛藏所見之稽胡地理分佈區〉，《大陸雜誌》第72卷第4期（1986年），頁3-5。

⁴⁹ 參見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1期，頁148-156。

⁵⁰ 此說源自《周書·稽胡傳》：「稽胡一曰部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從此說者有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頁132-165；張繼昊：《北系部落民與北魏政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5月），頁199；廖幼華：〈丹州稽胡漢化之探討〉，《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人文分冊》第7卷1期（1996年），頁296。

⁵¹ 《周書·稽胡傳》言其出自赤狄、山戎；《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丹州〉及《太平寰宇記》卷三五〈丹州·風俗〉引《隋圖經雜記》則云出自白狄。

⁵² 如周一良認為稽胡為來自西域中亞的雜胡，見〈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收《周一良集》第一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88-197。唐長孺認為稽胡為一包含匈奴、西域胡及西域胡以外其他各族的雜胡，而所謂雜胡，都是與古代匈奴有統屬上或血緣上關係的各種「別部」。見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頁439-444。周偉洲則認為稽胡是以內遷南匈奴五部為主體，融合西域胡及山居土著（包括漢族）而形成的一種雜胡，見氏著：〈試論魏晉時與匈奴有關的諸胡〉，收入馬大正等編：《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71-373，又見氏著：《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47。

⁵³ 土著說則有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1期，頁148-156。蒲立本E.G.Pulleyblank, "JI HU 稽胡：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nBei and Shanxi", in E.H.Kaplan and D.W.Whisenhunt (ed.), *Opuscula Altaica: Essays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 Western Washington, 1994, pp.498-529.轉引自林梅村：〈稽胡史跡考〉，《中國史研究》2002年1期，頁81。

⁵⁴ 如李志敏認為稽胡成份應以鐵勒為主，見氏著：〈魏晉六朝「雜胡」之稱釋義問題〉，《民族研究》1996年1期，頁77。林梅村認為稽胡屬於講突厥語族的北狄系統民族，見氏著：〈稽胡史跡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年1期，頁71-84。

⁵⁵ 操突厥語之丁零與突厥系諸民族均混有不同程度之高加索種血液，對此，可參見周連寬：〈丁零的人種和語言及其與漠北諸族的關係〉，收林幹編《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5-85。Bahaeddin Ogel 著，陳慶隆譯：〈匈奴以前之中亞〉，《大陸雜誌》第41卷第11期（1970年），頁8-32；吉謝列夫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冊（烏魯木齊：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頁69-70；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始講演錄》（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年），頁103-112。關於此書，韓昇先生認為未經陳寅恪先生審閱，故未敢斷定為陳先生的最終見解，但仍不失為一家之言。參氏著：〈隋史考證九則〉，《廈門大學學報》1999年1期，頁100。

人有異，是不足爲奇的。

甚至下迄唐代，唐人心目中的匈奴意象也是具有高加索種特徵的。戎昱〈苦哉行五首〉云：

「……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豈意遭戈挺。匈奴為先鋒，長鼻黃髮拳。彎弓獵生人，百步牛羊羶。……」⁵⁶

雖然詩中之匈奴可能是隱喻突厥或回紇，但仍可隱約看出唐人心中的匈奴種族意象。

由上引的魏晉時期史料來看，在魏晉時期，所謂的「胡狀」主要指的是高鼻、多鬚、深目一類的特徵。異民族種族外貌上的特殊表徵，到了魏晉時期似乎並未在短期內消失。究其原因，可能是漢人在與胡人通婚的這件事上，意願並不高，這點在《易林》中已有表現，當然這也與胡人多從事下階層的職業（如家奴、酒肆、伎人、傭兵等），長期停留在社會底層的情況（詳第五章）不無關係。此外，胡人慢慢滲居中原之時，雖已從遊牧轉為定居，然似未立即脫離原有的部落組織，胡人群居的情形還是很普遍。這種現象自然拖延了民族融合的步調，使得胡人雖然進入中國內地已有百年的時間，依然能保有原來的種族特徵。

上述魏晉時期對胡狀的認知是否等同於漢代的認知呢？目前似未能遽下結論，不過任何一種既有的觀念都有其逐漸演變的過程，呂思勉的一句話值得考慮，其云：「居地可以屢遷，俗尚易融合，惟容貌之異，卒不可泯。」⁵⁷因此，魏晉之前的漢代，雖未在文獻上具體表明胡狀的形貌，但一種「胡人形象與漢人不同」之觀念，是應該存在的。

⁵⁶ 《全唐詩》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006-3007。

⁵⁷ 呂思勉：〈胡考〉，收錄於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7。

第三節 有關匈奴種族人類學的若干問題

每一民族都有他的生物基礎，即人種基礎，民族在歷史過程中有分有合，人種底子也隨著雜交¹，且在一般情況下，人種的同化要比文化上的同化緩慢得多²。作為漢代（特別是西漢時期）胡人主要對象的匈奴，其人種究係為何？這是探討「胡狀」問題時所必須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命題，瞭解匈奴人的人種組成份子，對於探討「胡狀」問題應有積極的意義。然而如何才能收集到有關匈奴人形態特徵的材料確是一大難題。眾所周知，匈奴已經是一個完全消失的民族，雖然現今的蒙古學者一直努力宣稱他們是匈奴的直接後裔³，甚至也有少部分的維吾爾族學者也說匈奴是他們的祖先⁴，但他們的說法目前都只能視為是一種假說，談不上所謂學界的共識。長期以來，匈奴的人種歸屬是一個高度爭議的問題⁵，成為匈奴史研究中少數至今仍懸而未決的難題。究其原因，主要是古代文獻（特別是戰國至兩漢時期）中鮮少提及匈奴人的種族容貌特徵，而現今所謂「匈奴墓」中所出土的體質人類學材料也呈現分歧的狀態，在中國境內「匈奴墓」所出土的人骨人種大都屬於蒙古人種⁶，但在外蒙古、貝加爾湖、南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匈奴墓」中所出土的人骨，卻呈現出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兩大人種並存與混雜的現象⁷，雖然此種混雜的現象可以歸諸於是匈奴在擴張進入這些地區後，曾受到上述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原有歐羅巴種（Europoid）住民血統的滲透⁸，但

¹ 楊聖敏：〈回紇人的種族特徵試釋〉，《甘肅民族研究》1988年1期，頁71-72。

² 林 澐：〈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收氏著：《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83。（原刊《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2合期）

³ 如著名的蒙古共和國學者道爾吉蘇榮、義喜劉木蘇皆主此說，參見林幹：〈試論匈奴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收錄於林幹 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83-87。

⁴ 相關的爭論可參見馮大真 主編：《《維吾爾人》等三本書問題討論會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⁵ 孫 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年6期，頁556。

⁶ 潘其風：〈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收錄於徐元邦 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第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293-301。

⁷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年2期，頁3-23。

⁸ 周連寬：〈蘇聯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中國式宮殿遺址〉，《考古學報》1956年4期，頁55-66。
奇列諾娃 著，馮霞 譯：〈南西伯利亞塔加爾文化起源的主要問題〉，收錄於孫進己 等編：《中國

仍不能排除匈奴民族本身的基礎人種型態原本就是存在著此種混雜的人種類型⁹，以下擬從體質人類學考古材料上來探討這個問題。

4-3-1 匈奴墓葬中所見的相關人種材料

外蒙古著名的諾音烏拉 (Noin-Ula) 墓葬，是學界少有爭議的漢代匈奴墓葬，就其遺物中之漆碗底部鑄有「上林」二字，字體與漢隸不殊，另又其出土之絹物上繡有「新神靈廣成壽萬年」八字¹⁰，江上波夫考訂為新莽時期遺物¹¹。關於墓主之族屬，據發掘者柯茲洛夫 (Kozlov) 的說法是：「從墓葬推測，這裡居民屬於雅利安人種」¹²「就墓中所得之頭顱觀之，此輩系屬雅利安人而非蒙古人」¹³。但據角田文衛的說法，承梅原末治教授轉知，Ellis H.Minns 教授曾面告他諾音烏拉墓葬的人骨其實是蒙古人種¹⁴。後來蒙古於 1961 年再度於諾音烏拉發現了一批新的匈奴時期墓葬，年代斷在西元前一世紀到西元一世紀之間，其中曾掘出兩個成人頭骨，經測量後屬於蒙古人種中的古西伯利亞類型 (貝加爾型)¹⁵。據諾

考古集成 東北卷》(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頁 11-14。魯金科 著，潘孟陶 譯：〈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 年 2 期，頁 37-48。諾夫戈羅多娃 著，申屠榕 譯：〈蒙古民族起源的初期階段〉，《民族譯叢》1986 年 4 期，頁 48-52。

⁹ 林 幹：〈關於匈奴、東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種的探索〉，《內蒙古大學學報》1997 年 5 期，頁 1-10。

¹⁰ W.Perceval Yetts,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48 (1926), p.176-185, 譯文見向達：〈俄國柯斯洛夫探險隊外蒙古考古發現紀略〉，收林幹 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457-459。(原刊《東方雜誌》第 24 卷 15 號，1927 年 8 月)

¹¹ 江上波夫：〈北蒙古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新」の銘辭ある繡に就きて〉，文收河田清 編：《加藤博士還曆記念 東洋史集說》(東京：富山房，1941 年)，頁 167-178。

¹² R.K.柯茲洛夫 著，田華、張大瑞 譯：〈諾音烏拉墓葬群〉，收吳文衛 主編：《黑龍江考古民族資料譯文集 第一輯》(哈爾濱：北方文物雜誌社出版，1991 年)，頁 124-126。

¹³ 耶茲的原文是 "and the only anthropological information in the Report is Colonel Kozlov's opinion that the skulls are of "Aryan" rather than Mongolian type", 參 W.Perceval Yetts,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p.173.

¹⁴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的歸屬をめぐつて〉，收氏著：《增補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新時代社，1971 年)，頁 283。

¹⁵ T.Tóth, "Paleoanthropological Finds from the Valley of Hudjirte (Noin-Ula Mongolia)", *Acta Archaeologica* Vol.14 no.3-4 (1962), pp.249-253.

音烏拉第六號墓所出土的髮辮來看，又明顯可看出屬於蒙古人種¹⁶，據云這些髮辮有可能是來自墓主的妻子¹⁷。可見諾音烏拉在墓葬中，其人種狀態也是相當分歧。又諾音烏拉第六號墓所出土的刺繡毛織物殘片，上面刺有兩名騎士（圖1）¹⁸，其前額的卷髮令人想起犍陀羅式的雕刻，衣著與帽子則表現出典型的伊朗式風格，就其外貌來看，人種應屬歐羅巴種¹⁹。



圖1 諾音烏拉第六號墓所出土刺繡殘片上之騎士
摘自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圖版1。

¹⁶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年），頁22及圖版83。

¹⁷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164。中譯本參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 第二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2年），頁122。

¹⁸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圖版1。

¹⁹ S.I.Rudenko 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ユーラシア》季刊 第3期（1971年），頁35-36；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圖版1。

另外在第二十五號墓亦出土一人像刺繡（圖 2）²⁰，畫中人物頭髮濃密，梳向後方，前額寬大，眼睛巨大，上唇有濃密的鬍鬚，特別是人像的眼珠雖繡成黑色，但瞳孔卻是用藍絨繡成。其異於漢人的相貌顯非蒙古人種，而是接近於中亞及波斯所見的土蘭人種（Turanian）²¹，從人像寬而平的臉龐及高鼻的特徵來看²²，的確具有突厥系民族的面貌特徵。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些刺繡品有希臘化大夏（Graeco-Bactria）地區的風格²³，或甚至是來自於南俄²⁴，如勃勞烏卡認為，上述刺繡品中的人物和黑海北岸出土的斯基泰人的金銀器皿中及陶器上的人物完全一樣，這說明斯基泰人和屬於斯基泰的薩爾馬特人，已經把希臘式及巴克達利亞式的工藝品，經由中央亞細亞，傳到匈奴去了²⁵。



²⁰ V N.Basilov ed., *Nomads of Eurasia*,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89, p.40.

²¹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頁 70 及圖版 2，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p.167。中譯本參徐文堪、芮傳明 譯：《中亞文明史 第二卷》，頁 124。所謂的「土蘭人種」也稱為南西伯利亞人種類型，是一種高加索種與蒙古人種混雜的人種類型，參角田文衛 編：《世界考古學大系 第 9 卷 北方ユーラシア・中央アジア》（東京：平凡社，1963 年），頁 9；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 5。

²² Camilla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Vol.3 of Memoir of the Academy for Material Culture, Leningrad: 1932), p.29.

²³ S.I.Rudenko 著、加藤九祚 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頁 35。

²⁴ E.D.Philips, *The Royal Hordes*, London, Thomas & Hudson, 1965, p.121.

²⁵ 林 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67。

圖 2 諾音烏拉第二十五號墓出土人像刺繡

摘自 V.N.Basilov ed., *Nomads of Eurasia*, p.40.

外蒙古後來在一九六十年代再度在諾音烏拉和呼尼河沿岸發掘了一些匈奴墓葬。諾音烏拉尚未發現有歐羅巴人種因素的混入，但離諾音烏拉以西三百公里呼尼河沿岸發現的匈奴墓葬中，則存在有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兩大人種共存的現象²⁶。外貝加爾湖地區的情況與此類似，前蘇聯人類學家在考察外貝加爾匈奴人骨後，認為具有古西伯利亞類型和歐羅巴類型混合的特徵，得出了與當地原有居民的體質特徵有明顯區別、匈奴是外來民族的結論²⁷。

中亞地區匈奴墓(肯科爾匈奴、吉爾吉斯匈奴、天山匈奴)所發現的頭骨中，除了有典型蒙古人種中的「古西伯利亞類型」(圖3)²⁸外，還混有不少歐洲人種²⁹。在早期內陸亞洲的歐洲人種中，匈奴群體的歐洲人種特徵，是介於前蘇聯境內銅器時代的內亞歐洲人種種群與新疆地區的歐洲人種之間³⁰。塔拉斯河流域的肯科爾(Kenkol)墓地被懷疑是北匈奴在中亞時期的遺址，被埋葬的死者人種大部分屬於歐羅巴種，部分夾雜了蒙古人種成分³¹。在吉爾吉斯共和國境內的怛羅斯河流域或天山-阿賴山脈所發現的匈奴古墓，根據其出土人骨的調查研究結果，既有典型的蒙古人種，亦有典型的歐羅巴人種，也有兩者的混合類型。可見在西元一、二世紀左右在吉爾吉斯地區匈奴其人種並非單一，是各種胡族的集合體，即所謂的雜胡。江上波夫認為本來屬於蒙古人種的匈奴，在往吉爾吉斯地區遷徙的過程中，其民族的構成份子中已加入了當地原屬歐羅巴人種的烏孫、塞種、康居等先住民，暗示了其人種已趨於複雜化³²。但是我們也應考慮到，由純

²⁶ 潘其風：〈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頁 293-295。

²⁷ 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90 年 4 期，頁 428；潘其風、韓康信：〈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 年 4 期，頁 371。

²⁸ 角田文衛：《增補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頁 284。

²⁹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 3-23。

³⁰ 何惠琴、徐永慶：〈新疆哈密五堡古代人類顱骨測量的種族研究〉，《人類學學報》第 21 卷 2 期(2002 年)，頁 102-110。

³¹ 但該遺址也有可能是康居土著居民受匈奴文化影響的一個遺址。參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p.469-470。中譯本參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 第二卷》，頁 377-379。

³²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 年)，第一章〈中央アジアにおけ

粹的蒙古利亞種過渡到高加索種並非在短期內可以順利完成³³。匈奴本身若非原本即具有某種程度的歐洲人種成分，其歐洲人種化的過渡恐怕不會如此的迅速徹底。



圖3 前蘇聯學者所復原的肯科爾匈奴，屬於蒙古人種中的「古西伯利亞類型」

摘自 角田文衛：《增補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頁284。

在中國境內所發現的所謂「匈奴墓」中，有三個曾出土較完整的人骨材料，分別是桃紅巴拉、毛慶溝與上孫家寨。桃紅巴拉和上孫家寨的頭骨種系基本上屬於蒙古人種之北亞類型，但毛慶溝之頭骨種系屬於蒙古人種之東亞類型。同一時期北方草原地區的其他體質人類學材料一般而言皆有蒙古人種北亞類型與東亞類型混合的特點，潘其風先生據此推測匈奴族可能是在北方草原原有居民中發展起來的³⁴。

4-3-2 匈奴可能為一混血種型

以往學界普遍以文獻中沒有特別記載匈奴相貌與漢人有異為由，據此認為此正暗示匈奴與漢人同屬蒙古種³⁵。這是一個「默證」的問題（詳前節），雖然

る人種・民族・文化の形成と歴史の流れ》，頁40。

³³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頁12。

³⁴ 潘其風：〈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頁294-298；潘其風、韓康信：〈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頁367-375。

³⁵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收將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11。阿爾丁夫：〈匈奴種屬考〉，《內蒙古社會科學》2000年3期，頁42-45；阿爾

兩漢時期的文獻中缺乏對匈奴體質特徵的描述，但魏晉時期的文獻中卻留下不少匈奴人是高大、白皙的記錄（參前節）。日人內田吟風曾據此認為匈奴人至少在統治階層是屬於高加索種³⁶。孫機先生也指出：

在我國古文獻中，匈奴族的面貌有時被描寫得很像是白種人。如羯胡是南匈奴的後裔，……可見他們鼻高鬚多，具有白種人的特徵。久居塞內已與本地各族部分混血的南匈奴之後尚且如此，秦漢以前遊牧於塞外的匈奴人自不應例外。³⁷

不過因為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所謂「匈奴墓」，其人種皆為蒙古人種，而貝加爾湖附近所發現的匈奴墓雖混有部分歐洲人種，但也是以蒙古人種為主體³⁸，前蘇聯學者對於匈奴基本上屬蒙古人種似無異議³⁹。要解釋這種文獻與考古在人種上的歧異問題，最常被考慮到解釋的是：匈奴是一個多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因此其居民中雜有高加索種特徵的民族似乎不足為怪。然而我們是否也應考慮到，凡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其人種的組成總是會有某種佔優勢的族群（一個種族等同於一個國家的這種情形，似乎很少出現在古代的遊牧民族國家）。但這種情況又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佔優勢的人種族群同時也是統治族群；另一種情況是佔優勢的人種族群是被統治族群，而統治族群是屬於另外的不同種族。匈奴國家的種族組成結構究竟是屬於前者或後者，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我傾向認為匈奴是一個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混血的種族類型，其人種應與後來的突厥類似。其實贊成匈奴的種族為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歐羅巴種）之混血種的學者不少，如孫機⁴⁰、林幹⁴¹、李剛⁴²、趙斌⁴³、李昱東⁴⁴，更有主張匈奴其實就是歐羅巴種的，

丁夫：〈歐羅巴種還是蒙古種〉，《北方文物》2000年3期，頁52-58。

³⁶ 內田吟風：〈匈奴の人種体型について〉，《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88年），頁143-165。

³⁷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年6期，頁556-557。

³⁸ 潘其風：〈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頁293-301。

³⁹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的歸屬をめぐって〉，頁287。

⁴⁰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頁555-561。

⁴¹ 林幹：〈試論匈奴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收錄於氏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5-87。

⁴² 李剛：〈漢晉胡俑及佛教初傳中國摭遺〉，《東南文化》1994年1期，頁122-129。

⁴³ 趙斌：〈咸陽塔兒坡戰國秦墓出土騎馬俑族屬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年4期，頁40-44。

⁴⁴ 李昱東：〈早期匈奴帝國核心部族的考證〉，《中興史學》第7期（2001年，台中），頁1-25。

如余太山⁴⁵、內田吟風⁴⁶、Otto J.Maenchen-Helfen⁴⁷等。麥高文(W.M McGovern)認為東胡也同匈奴一樣，是一種阿爾卑種與蒙古人種的混合種，甚至因鮮卑人有「黃鬚」的記載而認為他們含有“原諾的克人種”的血液(proto-Nordic blood)⁴⁸。

關於匈奴的起源地區是個至今仍在爭辯的議題。俄國學者曾有匈奴起源自內蒙古東部的看法⁴⁹。但由於胡人體質上所呈現的人種混血特徵，本文認為匈奴人即使是起源於內蒙古東部，但與南西伯利亞的關係應相當密切。顧頡剛嘗認為匈奴之族必在西北⁵⁰，小川琢治也指出匈奴原先應分佈於涇、洛水源之更西北方，戰國時因義渠強大之故而暫時南下受阻⁵¹。江上波夫雖認為匈奴屬於蒙古人種，但也指出匈奴的原鄉可能要往葉尼塞河上游、陰山-鄂爾多斯一線西面的戈壁西部、準噶爾方面去尋找。也就是說，從戰國至前漢時代匈奴所製作的青銅器——即所謂的綏遠(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來看，其與葉尼塞河上游的塔加爾文化青銅器以及天山-阿賴山脈的薩迦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這暗示春秋時代(前六-前五世紀)匈奴的原鄉，可能還要在陰山-鄂爾多斯的更西北方⁵²，匈奴文化的社會層面應曾受到薩彥-阿爾泰諸族(丁零系)貴族階層的明顯影響⁵³。

⁴⁵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收氏著《塞種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42-271。(原載《文史》第33輯)

⁴⁶ 內田吟風：〈匈奴の人種体型について〉，頁143-165。

⁴⁷ Otto J.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364.

⁴⁸ W.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39, p.471; 譯文參 章巽 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261。

⁴⁹ S.Minyaev, "On the Origin of the Hiung-nu", *Information Bulletin Vol.9* (1985), pp.69-78, 在該文中，Minyaev 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體現出「原匈奴」文化的特徵。

⁵⁰ 顧頡剛：〈殷遺民流竄西北者結合鬼方以周〉，《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九卷(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1990年)，頁7323-7324。

⁵¹ 小川琢治：〈北支那先秦蕃族考〉，收 羽田亨 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 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年)，頁284、308。

⁵² 江上波夫 編：《中央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年)，第一章〈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人種・民族・文化の形成と歴史の流れ〉，頁44。

⁵³ Camilla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p.15; アリェクサンドル・ミチューリン 著，佐藤純一 譯：〈南シベリアの古代文化(3)〉，《古代學》第5卷3、4號(1957年)，頁327-328。

若單從種族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漢代藝術形象中的胡人，其表現的體質特徵應接近突厥民族之種型。其實早有學者提出純匈奴中的優勢種族應為突厥種的主張⁵⁴。伯希和亦認為匈奴人（在語言方面）應屬突厥種，特別是他們的政治領導人⁵⁵。一般常將突厥歸入蒙古人種的範疇中⁵⁶，其實其人種特徵與黃種人還是存有區別，一如 G.Elliot.Smith 指出的：

在許多人類學的書中，蒙古人種和突厥人被混為一談。後者的家鄉在中亞，與葉尼塞河的源頭相距不遠。無論怎樣強調這兩個民族之間非常明顯的不同都不嫌過分。事實上很難更清楚地想像這兩個民族彼此的不同之處了。突厥人的臉型突出，與蒙古人種極為扁平的臉截然不同。他們的頭髮是波浪形的、橫斷面是橢圓形的，與蒙古人種直的、橫斷面為圓形的頭髮相反。突厥人有著飄拂的絡腮鬍子，事實上是地球上毛髮最發達的民族之一，而蒙古人種的特徵是毛髮稀少。蒙古人種和突厥人的這些特徵和其他特徵有著許多明顯的不同，突厥人實際上是阿爾卑斯人種的一個高度特化的分支。……我們不應混淆突厥人與蒙古人，儘管前者往往混有蒙古人種的血統。他們顯然主要是阿爾卑斯人。……阿爾卑斯人形成特徵的區域一定在鄰近土耳其斯坦的某個地方。⁵⁷

江上波夫同樣指出：將所謂的突厥人視為是蒙古人種是極大的錯誤，維吾爾、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的確有某種程度的蒙古人種化，但在整體上，其人種還是在歐羅巴人種範疇內是無庸置疑的⁵⁸。Bahaeddin Ogel 也有同樣的見解，他曾指出西元前二千年活動於阿爾泰、薩彥嶺及天山一帶的寬頭型白色人種，就是日後突厥人的祖先，而這些白種人是與歐洲之阿爾卑斯人種相似的人群⁵⁹。

⁵⁴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3, p.68.

⁵⁵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4、53；中譯本參 藍琪譯：《草原帝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8、84。

⁵⁶ 楊聖敏：〈突厥回紇史中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1993年3期，頁69。又林惠祥：《世界人種誌》（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也持此種分類法，頁34-36。

⁵⁷ G.E.Smith 著，李申等譯：《人類史（Human Histor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93-94、112。

⁵⁸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頁33-34。

⁵⁹ Bahaeddin Ogel 著，陳慶隆譯：〈匈奴以前之中亞〉，《大陸雜誌》第41卷11期（1970年），頁8-9。

4-3-3 中亞自古即為人種交會區

中亞地區自古以來一直是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兩大人種的交會地帶⁶⁰，在南西伯利亞還有屬於接近北歐人種（Nordic）的族群分佈。早在西元前七至五世紀期間，鹹海地區的居民看來已是一種混合種族，主要為由安德羅諾沃（Andronovo）底層所代表的歐洲人種和起源於中亞的蒙古人種混合而成⁶¹。西元前第一千紀中葉，前來中亞的民族越來越多，他們大概是與突厥同源的民族。在西元前 3-2 世紀，他們同當地人大量混合，加強了對當地居民的語言同化。因此，七河流域地區，天山和錫爾河中游一帶居民的人種面貌也逐漸發生變化。在西元前後，一種與突厥語相近的語言便廣泛流行於烏孫和康居遊牧民之間。匈奴的西進更是突厥成分滲透的強大推動力。在西元初幾個世紀，藥殺水（錫爾河）塞人被加緊同化，最後佔上風的就是突厥種。《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和烏孫的考古文化》一書的作者阿基舍夫、庫沙耶夫認為居於天山和帕米爾的塞種乃是尖帽塞人，因與中亞蒙古利亞人種為鄰，早就開始（至少在西元前 5 世紀）逐漸蒙古利亞化⁶²。考古學家最近的研究和發現表明，自新石器、青銅時代開始，西伯利亞和斯堪的納維亞諸民族間自遠古就存在過深刻的聯繫⁶³。如先秦古族丁零，蒙文通先生認為即是狄，屬高鼻深目的高加索種⁶⁴；又如堅昆或黠戛斯在古籍上留有「長大、赤髮、皙面、綠瞳」⁶⁵的紀錄。拉德洛夫認為葉尼塞河畔的這些黠戛斯人最初並不是一個說突厥語的民族⁶⁶，他們很可能是被突厥化的葉尼塞 Ostiak 人，甚至是源自斯拉夫人⁶⁷。麥高文強調：

⁶⁰ Bahaeddin Ogel 著，陳慶隆：〈匈奴以前之中亞〉，頁 8-32。

⁶¹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24。中譯本參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 第二卷》，頁 5。

⁶² 黃振華、張廣達：〈蘇聯的烏孫考古情況簡述〉，收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95-196。

⁶³ K.M.穆沙耶夫 著，舒平 譯：〈突厥語和世界其他語言的接觸〉，《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 1 期，頁 266。

⁶⁴ 徐中舒：〈夏代的歷史與夏商之際夏民族的遷徙〉，收氏著：《先秦史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頁 48。

⁶⁵ 《新唐書·回鶻傳 下·黠戛斯》，頁 6147。

⁶⁶ René Grousset 著，藍琪 譯：《草原帝國》（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42。

⁶⁷ 陳慶隆：〈堅昆、黠戛斯與布魯特考〉，《大陸雜誌》第 51 卷第 5 期（1975 年，臺北），頁 4-5。

長頭型的白色人種住在西伯利亞南部，他們也許曾傳入蒙古利亞北部，且在甚早的史前時代，他們或曾統有整個蒙古高原，也非全不可能。……匈奴人的確屬於突厥種而非蒙古種，似無疑問。換言之，匈奴人最早的起源，也許近於“白種”，而不近於“黃種”。……古匈奴人在種族上和語言上，都屬於突厥種。……匈奴人因為曾久居遠東，且常和中國人及其他的蒙古利亞種人通婚，故極可能在他們的血管中滲有頗多的蒙古利亞種血液，因使哥德人及羅馬人對他們的外貌感到驚異，可是他們絕不是純血的蒙古利亞種人。即使匈奴人仍居於蒙古利亞境內時，已因與印度歐羅巴種的阿蘭那人及各種芬烏格裏安人民雜婚之故，而使其所含的蒙古利亞種因素，趨於減少，而不增多。這一主張，更因在匈牙利及歐洲其他各處匈奴古墓中發掘所得的人骨，而獲得證實。從這些骨骼加以判斷，可知西元第四世紀及第五世紀時侵入歐洲的匈奴人，其種族帶有高度的混合性，而其中的蒙古利亞血統，不過是若干重要因素之一而已。⁶⁸

人種學家孔恩 (C.S Coon) 的態度較為保留，他認為假如匈奴人果真是匈人的祖先，那麼蒙古的早期住民無疑是蒙古人種，並且是屬於通古斯與蒙古這兩個至今仍在那兒的人種要素。但他也指出：在阿瓦爾人 (Avars) 墓葬中所發現的北歐人種頭骨 (他稱之為「亞洲的北歐因素 Asiatic Nordic element」)，是阿瓦爾人在離開蒙古高原之前就已混入的，但這種影響尚不可能滲入全部的匈人及阿瓦爾人民族之中⁶⁹。

故在此本文認為匈奴的血統是極為複雜的，可能是一種與突厥接近的黃白混血種型，其混血的程度也不一。匈奴人民的種族特徵應呈現分歧的狀態，有的可能黃種人的性狀多些，有的可能白種的性狀強些，但終因是混血之故，所以看來還是與純蒙古種的漢人有異。自秦、漢間冒頓擊破東胡並西併西域以來，匈奴已成為「百蠻大國」，故治下部落屬國甚多，種族複雜⁷⁰，其族內的民族成分不是單一的⁷¹。葉舒憲等人的看法可供我們參考：

⁶⁸ W.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p.95-99、367；譯文參 章 巽 譯：《中亞古國史》，頁 102-106、169。

⁶⁹ C.S Coon, *The Races of Europ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 p.232.

⁷⁰ 雷家驥：〈試論「五胡」及其君長的漢化思考〉，「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主辦，2003 年 12 月 12、13 日），頁 7、49。

⁷¹ 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5。

白種人充其量只是胡人或匈奴人的一支，很難僅僅由此就斷定整個匈奴（或匈奴集團的“基幹民族”）均為白種。所謂“匈奴”，尤其是“胡”的大群裡，確有一支是高鼻多鬚，表現出更多的“塞：斯基泰”的“白色”因素。他們是更靠近西部、更鄰近中亞高原的“胡”人及其後裔，而血液帶著突厥人種成分。匈奴“胡”並不都深目多鬚，其人種來源不單純。標準型的“胡：匈奴”，圓面寬鼻無鬚，或說“面目模糊”，不過他們的血液混雜，羣有突厥或塞人成分。“匈奴”不過後人心目中“胡”的標準型，其主幹屬蒙古人種，不過間雜著突厥乃至塞種、芬人的成分。⁷²

此處擬舉一例，圖 4⁷³是一位烏茲別克族婦女，在他的臉上，我們可發現她既有高加索種的某些特徵（如較高的鼻樑與微陷的眼眶），也有著某些蒙古人種的特徵（大臉、高顴、豐腴的臉頰）。但觀察之下，還是可發現與漢人一類的純粹蒙古人種仍然有別，匈奴人很可能是屬於此種混血的人種類型。



圖 4 烏茲別克族婦女

摘自 《經典》第 56 期（2003 年 3 月號），頁 79。

⁷²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947-949、964、971。

⁷³ 林志恆：〈中亞五國：亞洲心臟，世界邊緣〉，《經典》第 56 期（2003 年 3 月號），頁 79。

4-3-4 匈奴與南西伯利亞阿爾泰部落的關係

林澧先生曾指出：從文獻記載判斷，西元前三世紀後期到前二世紀中期，匈奴的本體應活動於內蒙古中部偏北的地區，但也可以設想這個匈奴本體在中國境外度過早期生涯⁷⁴。就考古資料來看，戰國中期之前中國北疆所謂北方式青銅器的紋飾風格，的確存在不少有別於中亞及南俄斯基泰藝術的本土特點⁷⁵。然而自戰國中期以降，特別是在一些大陸考古工作者所宣稱的匈奴墓中所出土的青銅器或金銀牌飾，卻有濃厚的南西伯利亞及中亞斯基泰藝術風格⁷⁶，我懷疑這應與匈奴勢力的崛起有關。就漢代所表現的胡人形象看來，其頭戴尖帽，高鼻多鬚的特徵實與中亞塞種⁷⁷相差無幾，甚至幾乎相同。早有學者已指出，中國阿爾泰及天山北部、東部的早期文化，究竟是塞人文化，還是匈奴文化？實際上很難區別。因為兩者間存在著太多的相似性。匈奴在早期階段曾與塞人文化存在過相當頻繁的接觸與交往，故匈奴人種中也包含了蒙古、塞種等複雜的成分⁷⁸，E.H.Parker曾認為希羅多德所述與希臘、波斯接觸之塞種，與中國之匈奴歐洲之匈人正同，此三者在種族上彼此息息相關⁷⁹。譬如阿爾泰地區著名的巴澤雷克古墓群，雖然學界普遍認為其族屬應是早期活躍於中亞歷史的塞種（Saka），但該墓發掘者之

⁷⁴ 林澧：〈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收氏著：《林澧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84。（原刊《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2合期）

⁷⁵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史語所集刊》64本第2分（1993年），頁231-408。

⁷⁶ 田廣金：〈近年來內蒙古地區的匈奴考古〉，《考古學報》1983年1期，頁7-24；林澧：〈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學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合期，頁127-141；郭素新：〈再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合期，頁95-96；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頁329-357。

⁷⁷ 王小甫：〈先秦我國西北的塞種〉，《西北史地》1987年1期，頁57-64。尹偉先：〈塞克的涵義、起源與分佈〉，《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3期，頁53-60。李特文斯基、波格列博娃、拉耶夫斯基 著，李琪 譯：〈論東突厥斯坦塞人的早期歷史〉，《新疆文物》1988年3期，頁115-124。李特文斯基 著、馬蘇坤 譯：〈帕米爾塞人墓葬中的宗教信仰〉，《新疆文物》1989年3期，頁108-124。

⁷⁸ 張志堯：〈略論我國阿爾泰、天山北部與東部的塞人——匈奴文化〉，《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6期，頁38-45。

⁷⁹ 巴克爾（E.H.Parker）著、黃淵靜 譯：《韃靼千年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頁3。

一的魯金科 (S.I.Rudenko) 卻曾懷疑該墓葬的主人也許是早期匈奴而非塞種⁸⁰，著名的突厥語言學家克勞森 (G.Clauson) 也有過相同的疑問⁸¹。John E.Haskins 指出：陝西神木村所出土的虎形牌飾，與阿爾泰地區 Bashadar 遺址墓廓上的虎形紋飾非常類似，神木村出土鹿形怪獸誇張的大角，也與巴澤雷克二號墓乾屍身上的刺青圖案幾近一致⁸²。斯基泰人屬於阿爾泰系，還是伊朗系，仍是個疑問⁸³，在埃及出土的西元前五世紀斯基泰人雕像，就有混有蒙古人種的特徵 (圖 5)⁸⁴，其實威爾杜蘭早已指出，斯基泰人之中，有一半是蒙古人種，一半是歐洲人種⁸⁵。阿爾泰地區的青銅及早期鐵器時代體質人類學材料表明這個區域是以高加索種為主而混有蒙古人種⁸⁶，匈奴人種中的高加索種成分應與此區域有關。

⁸⁰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52-53. John F. Haskins, 'China and the Alta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s Vol.2 (1988), pp.6-7.

⁸¹ 他說：「有些是實事人人皆知的，如葬在諾音烏拉 (Noin-ula) 之地的首領是“匈奴人”，而葬在巴澤雷克 (Pazyryk) 的卻不是“匈奴人”。」見 G.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 譯：〈突厥、蒙古、通古斯〉，《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 2 期，頁 115。

⁸² John E.Haskins, loc.cit, pp.4-6.

⁸³ 江上波夫：〈北方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頭皮剝奪の風習〉，《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28 號 (1962 年)，頁 2，譯文可參蔡葵 譯：〈歐亞大陸的剝頭皮習俗〉，收雲南省博物館 編《民族考古譯文集》1985 年 1 期，頁 118。

⁸⁴ Ellis H.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71, p.xxxvii.

⁸⁵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著，張身華 譯：《世界文明史 第二冊 埃及與近東》(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4 年)，頁 253。

⁸⁶ Karl Jettmar, "The Altai Before the Turk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3 (1951), pp.135-223; T.A.Chikisheva & D.V.Pozdnyakov,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Gorny Altai Populations in the Hunno-Sarmatian Period",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3 (2000), pp.116-131; T.A.Chikisheva, "Origins of the Early Iron Age Nomads in Gorny Altai: Physical Anthropology Evidenc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4 (2000), pp.107-121.



圖 5 埃及出土的西元前五世紀斯基泰人雕像

摘自 Ellis H.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p.xxxvii.

此種黃、白混血的種型在漢代的胡人造形藝術中經常出現，其特徵是豐頰、顴骨明顯、高鼻、眼眶微陷。如西漢陽陵出土陶倉上的胡人頭像（圖 6）⁸⁷、徐州十裏鋪出土東漢陶俑（圖 7）⁸⁸、陝西扶風官務漢墓（新莽時期）出土陶俑（圖 8）⁸⁹、洛陽出土東漢武士陶俑（圖 9）⁹⁰；國外收藏品也有類似的造型，Leon Levy and Shelby White 收藏品中一對西漢時期的牌飾，其上刻畫的人物頭戴胡人尖帽，有豐頰大鼻的特徵，被認為可能是匈奴的形象（圖 10）⁹¹；Jessica Rawson 的著作中也引了一件西漢時期的人形銅燈，人物頭戴尖帽，面貌特徵與前述幾件

⁸⁷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編：《漢陽陵》（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年），圖版 109。

⁸⁸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江蘇徐州十裏鋪漢畫像石墓〉，《考古》1996 年 2 期（北京），圖版 4。

⁸⁹ 周原博物館：〈陝西扶風縣官務漢墓清理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 年 5 期，頁 21、封面 2。

⁹⁰ 國立歷史博物館 編委會：《陶俑》（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8 年），圖版 5。

⁹¹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p.93-94, fig.6.

類似（圖 11）⁹²。直至現代，此種臉型依然可在當代的蒙古人（圖 12）⁹³、哈薩克人（圖 13）⁹⁴、烏茲別克人（圖 14）⁹⁵、土庫曼人（圖 15）⁹⁶、圖瓦人（圖 16）⁹⁷、伊朗人（圖 17）⁹⁸、烏克蘭人（圖 18）⁹⁹中發現，甚至生活於北歐北極圈的拉普人（圖 19）中也有此種臉型¹⁰⁰。



圖 6 西漢陽陵出土陶倉上的胡人頭像

摘自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編：《漢陽陵》，圖版 109。

⁹² Jessica Rawson, "Thinking the Pictures: tomb figures in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afterlif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61* (1996-1997), p.32.

⁹³ 張麗華 等編：《四裔展風采》（臺北：錦繡出版社，1994 年），頁 35。

⁹⁴ 杜若甫、葉傳昇：《中國的民族》（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85。

⁹⁵ 杜若甫、葉傳昇：《中國的民族》，頁 105。

⁹⁶ 日本學習研究社 編、王志遠 等譯：《世界民族大觀 4 北亞與西亞》（台北：自然科學文化事業公司，1978 年），頁 16。

⁹⁷ Vladimir N. Basilov ed., *Nomads of Eurasia*, Los Angeles: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89, p.110.

⁹⁸ Siba Shakib 著、潘 娟 等譯：《哭泣的阿富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封面 2。

⁹⁹ 加藤九祚 監修：《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東京：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實行委員會，1998 年），頁 62。

¹⁰⁰ 日本學習研究社 編、王志遠 等譯：《世界民族大觀 5 歐洲》，頁 18-19。清末斌椿在《乘槎筆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中曾記載北歐人是：「男女皆闊面豐頤，肉色紅紫，身被鳥獸羽皮，大有蒙古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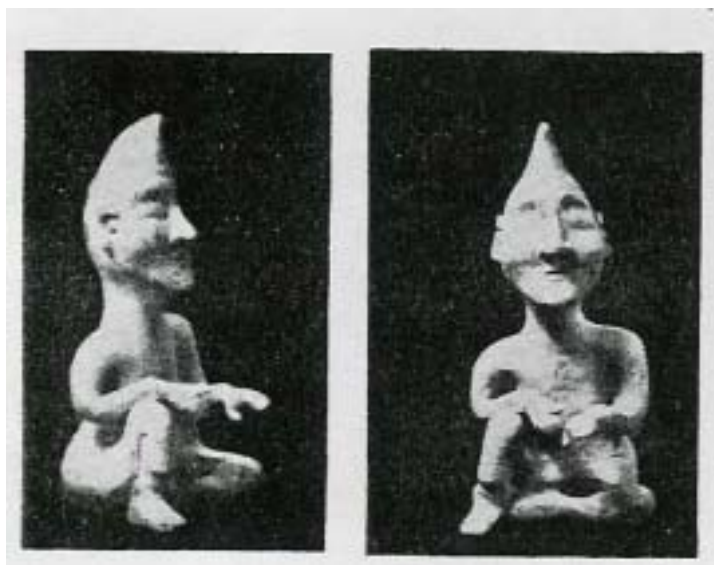


圖 7 徐州十裏鋪出土東漢陶俑

摘自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江蘇徐州十裏鋪漢畫像石墓〉，圖版 4。



圖 8 陝西扶風官務漢墓出土陶俑

摘自 周原博物館：〈陝西扶風縣官務漢墓清理發掘簡報〉，頁 21、封面 2。



圖 9 洛陽出土東漢武士陶俑

摘自 國立歷史博物館 編委會：《陶俑》，圖版 5。



圖 10 Leon Levy and Shelby White 收藏品牌飾上的胡人

摘自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p.93, fig.6.



圖 11 西漢時期的胡人造型銅燈

摘自 Jessica Rawson, "Thinking the Pictures: tomb figures in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afterlife", p.32.



圖 12 蒙古族男性

張麗華 等編：《四裔展風采》，頁 35。



圖 13 哈薩克族女性

摘自 杜若甫、葉傳昇：《中國的民族》，頁 85。



圖 14 烏茲別克族女性

摘自 杜若甫、葉傳昇：《中國的民族》，頁 105。



圖 15 土庫曼族女性

摘自 日本學習研究社 編：《世界民族大觀 4 北亞與西亞》，頁 16。



圖 16 圖瓦人男性

摘自 Vladimir N.Basilov ed., *Nomads of Eurasia*, p.110



圖 17 伊朗女性

摘自 Siba Shakib 著：《哭泣的阿富汗》，封面 2。



圖 18 烏克蘭女性

摘自 加藤九祚 監修：《黄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頁 62。



圖 19 北歐的拉普族人

摘自 日本學習研究社 編：《世界民族大觀 5》，頁 18-19。

4-3-5 匈奴人種的歷史變化

從考古文物、體質人類學材料與文獻資料來看，匈奴居民的成分是複雜的，匈奴人不可能只有單一的族源¹⁰¹，匈奴族的人種構成是多元的¹⁰²，欲精確的斷定其種族恐有其困難度¹⁰³。關於匈奴的人種問題，角田文衛的看法值得重視。他認為：匈奴本應為純粹的蒙古人種，但在其發展及後來強大後的擴張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經常與南西伯利亞西部及西域的白色人種住民接觸，而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戰爭掠奪的行動中，擄掠女性成為奴隸或作為自己的側室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隨著匈奴勢力在西域的不斷擴張，西方歐洲人種的血液便不斷的滲入匈奴，而最終導致了其血統純淨性的喪失。因此匈奴人的血統是與時俱變的，原本是純粹蒙古人種的匈奴人從西元前三世紀末葉以來，由於與各種不同民族接觸，特別是與歐洲人種諸部族混血的結果，其原本屬於蒙古人種的血液便迅速的喪失¹⁰⁴。Otto J.Maenchen-Helfen 提出另一種解釋，他認為匈奴人種中的蒙古人種成分，雖會因

¹⁰¹ 烏 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422。

¹⁰² 朱 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北方文物》1994 年 2 期，頁 8。

¹⁰³ Otto J.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358.

¹⁰⁴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的歸屬をめぐって〉，頁 286-291。

大量漢朝叛逃者及漢兵俘虜的加入而得到了增強，但匈奴亦長期的控制新疆，勢必又會從新疆攜回相當數量的高加索種人口。匈奴中的高加索種成分最初可能來自於其隸屬的部落，然隨著匈奴在西元前二世紀的征服圖瓦（Tuva）地區，大量高加索種人口混入的結果，會使他們的人種更朝向歐洲人種化¹⁰⁵。本文認為角田文衛與 Otto J.Maenchen-Helfen 的見解都是兩個值得思考的面向，不過也要補充一點，即匈奴人與歐洲系人種混血的時間，可能還要更早。透過前章先秦時期戎狄圖像的探討，可以發現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北方即有類似歐洲人種或突厥系民族的活動。雖然匈奴正式出現於中國文獻的時間是在西元前三世紀末，但匈奴民族在形成之初，極可能已接觸到此類人種的住民，因此匈奴人與歐洲系民族混血的歷史進程，很可能在更早的時期即已開始。復因後來控制了西域，由於西域對匈奴的財源有很大的幫助¹⁰⁶，因此從西域獲得的財源及兵源補充應對匈奴有重要影響，故匈奴人口中混入大量西域的居民也是可以想見的。

總之，本文認為匈奴可能接近黃、白混血的人種類型，這種類型在現今的突厥系民族身上仍可見到。這種人種類型的居民甚至自新石器時代起即已活動於中國北方與內蒙古東部一帶（參前章），文獻上胡人最早活動的區域也屬於此區，這或許可以解釋目前考古出土人骨人種¹⁰⁷與魏晉文獻及畫像磚石藝術圖像矛盾的現象。

¹⁰⁵ Otto J.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pp.370-374.

¹⁰⁶ 管東貴師：〈中國北疆問題的回顧與前瞻〉，《政治與文化》第3期（1985年，台北），頁99。

¹⁰⁷ 相關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可參考以下論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組：〈赤峰、寧城夏家店上層文化人骨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2期，頁157-169；王明輝：〈遼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種系構成及相關問題〉，《華夏考古》1999年2期，頁56-66、76；朱泓：〈夏家店上層文化居民的種族類型及相關問題〉，《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1期，頁111-122；朱泓：〈中國東北地區的古代種族〉，《文物季刊》1998年1期，頁54-64；潘其風、韓康信：〈內蒙古桃紅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頁367-375；潘其風、韓康信：〈東漢北方草原遊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1982年1期，頁117-135。

第四節 匈奴考古方法論問題的檢討

在匈奴人種的問題討論中，中國境內所謂「匈奴墓」中所發現的頭骨遺骸是相當關鍵的，尤其墓葬的體質人類學報告，是論證匈奴人種問題時極為重要的依據。依據目前所發表的報告來看，中國境內匈奴的人種可能屬於蒙古人種。但在筆者研究的過程中，卻發現有不少被冠上「匈奴墓」的考古報告，實際上存在著不少方法上的問題。

其實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就學科專業而言，實不該隨意對考古學者的研究成果發表意見。但是因為長期以來，歷史研究者，特別是古代史的歷史學者，經常將考古學者的地下發掘及研究成果作為一種論證的重要佐證，甚至是將之視為是史料的一種，此種方法已成為史學研究中一種常見的論證手段。歷史學家之所注意考古學成果，多數是關心挖出了什麼東西，有什麼可以證實或影響自己某些學術見解的新發現，而較不去注意（或由於缺乏有關專業知識）考古學家所得出的結論的依據，也甚少去質疑他們研究過程及手段的科學性與合理性¹。對於沒有伴隨文字出土的古代遊牧民族墓葬而言，考古學者對於墓葬的研究結論，是否能成為歷史學者研究族屬問題的主要依據，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特別是當文獻上的研究成果與考古學者所發表的成果相左時，這個問題就更值得更進一步思考。

4-4-1 「二重證據法」在游牧民族考古的運用問題

按常理來看，若考古學的研究成果與文獻史料相符時，通常這個結論理應更接近於歷史學家所追求的歷史事實。但若情況正好相反，文獻上的記載與考古發掘的結果相悖時，那麼首先要反省的是文獻與考古研究的其中一方是否存在著問題（當然考古材料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問題是在於其論證或解釋的過程）。但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即雙方不必然都存在著問題，此種文獻與考古研究成果相左

¹ 朱鳳瀚：論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歷史研究》2003年1期，頁20。

的情形，反倒可以讓我們去反思、或激發出其他的思考點，譬如說學科的方法論問題。因為無論歷史學家對文獻材料的鑽研或考古學家對地下發掘物的研究，都牽涉到解釋的問題。如果二者的結論呈現相左的現象，正是提供一個方法論反省的契機。當然這種文獻與考古的相悖可能僅是一個暫時性的現象，或許有朝一日有更多的新史料或新出土物發現時，此種相悖的現象就會迎刃而解。

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初曾提出「二重證據法」的概念，他說：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²

但王國維這種「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³的方法，後來卻有被濫用的傾向。王國維所指的地下材料，據《古史新証》的說法，主要指的是甲骨文與金文⁴，此二者仍屬文字資料。但後人常將沒有文字的地下實物，也視為是一種重要的地下材料，而且經常取之運用於證史。自「二重證據法」提出後，中國歷史與考古學界便流行以考古文化來比附古文獻上的民族，或以考古文化特徵來追溯其族源。雖然結合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來了解古代社會是一種流行趨勢，但考古學家也指出，兩者之間並不一定有對應關係⁵。所以，當考古研究者為地下所出土的墓葬尋找其族屬時，假如這個墓葬沒有出土任何的文字實物的話（這在古代的早期游牧民族墓葬相當常見），那麼其族屬問題便很容易陷入爭議之中。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對其所運用的史料應先做一個批判的工作，既然有

² 王國維：《古史新証》（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3。

³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收《陳寅恪先生文集（二）》）》（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219。

⁴ 王國維說：「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一）甲骨文字殷時物自盤庚遷殷後迄帝乙時（二）金文殷周二代。」氏著：《古史新証》，頁4。

⁵ 王明珂：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收氏著：《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頁66、69-70。

不少學者將考古研究成果作為匈奴族屬研究的重要史料，那麼對於這些長期以來廣為學者援用的考古研究成果，也應給予相當的批判。在這樣的一個出發點上，本節擬對之前大陸考古研究者所公佈的所謂「匈奴墓」，以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觀點來重新審視其方法論上問題。特別是他們對墓葬族屬的判定方式，因為牽涉到解釋或推定的面向，相當值得我們檢討。

以考古材料去探索一個民族的族源，或去證明某一考古文化代表某一歷史人群，實際上是有其困難性的⁶，這種情形在沒有發展出文字的早期遊牧民考古中相當明顯。但在過去近四十餘年來，大陸的考古工作者陸續發表了不少名為「匈奴墓葬」的考古發掘報告，然而這些墓葬的族屬，是否真的全部都是匈奴人，除了部分學者外⁷，似乎少有人去質疑過。其實亦鄰真先生很早就曾指出：

從匈奴時期墓葬中所發掘出來的，並不一定就是匈奴人的骨殖。匈奴貴族糾集了各式各樣的人組成國家機器，統治階級中不僅包括蒙古高原各族的上層人物，還傍及中亞甚至漢族，匈奴國的生產者和士兵有好多也不是匈奴人。應當審慎地對待考古學和人類學資料，不能作隨心所欲的解釋。⁸

中國北疆一帶在東周時期曾流行所謂的「北方式青銅器」（或稱「鄂爾多斯式青銅器」）⁹，大陸考古工作者也發掘了為數不少的所謂「戎狄」墓葬，但他們是否就是匈奴的前身？大陸考古學界習慣將許多內蒙古及鄰近地區所發掘的古代草原民族墓葬一律都歸諸為「匈奴墓」，對於這種命名，本文認為應該持比較謹慎的態度。幸而近來已有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對這些草原民族的墓葬歸類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¹⁰，其實若經仔細的分析比對，還是可以發現中國北方地

⁶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史語所集刊》第65本第2分（1994年），頁412、414。

⁷ 就筆者所見，熊存瑞及宋新潮兩位學者曾對此提出過質疑，見熊存瑞：《先秦匈奴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1期，頁110-113；宋新潮：《匈奴早期活動地域考辯》，《民族研究》1993年6期，頁74-80。

⁸ 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收錄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編：《元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90。

⁹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考古學報》1988年3期，頁257-274。

¹⁰ 如最近甫出版，由趙化成、高崇文所編寫的《秦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一書，對匈奴考古部分的介紹便採取較為保守的敘述，見該書250頁。

帶（西從隴東、寧夏東至燕山）的眾多考古遺址，其文化內涵還是可以明顯看出存在著地域性的差別¹¹。林澧先生也指出：

對考古工作者來說，當然不應仍按司馬遷的觀點去看匈奴的族源問題，而應首先注意漢代匈奴聯盟所佔據的廣大地域中的前期遺存在文化上和人種上是否真有一致性，抑或可分出不同系統，在這樣的基礎上再重新考慮匈奴的族源問題。¹²

因此這些為數眾多的古代草原民族墓葬是否都可名之為「匈奴墓」？頗值得我們再次審視。

4-4-2 大陸地區匈奴考古發掘報告的問題點

目前大陸以「匈奴」為題發表的考古報告為數不少，也有一些考古報告把墓葬之族屬定為匈奴。本文認為當前大陸地區的匈奴考古發掘報告，普遍存有下列的問題：

第一，大部分墓葬斷代都很模糊，橫跨的時代過長，多數斷代落在東周時期而非秦漢。

第二，目前中國境內所發現的秦漢時期匈奴墓葬為數不多，這些被歸為「匈奴墓」的墓葬內容，究竟有多少與外蒙古及前蘇聯境內所發掘的秦漢時期「匈奴墓」相似，兩者間是否有承繼的關係，大陸學者似乎著墨不多。除烏恩¹³先生與田廣金¹⁴先生的論著外，之前較少見到以大陸地區的「匈奴墓」和外蒙古、前蘇

¹¹ 詳見宮本一夫的分析，氏著：《オールドス青銅器文化の地域性と展開》，《古代文化》51/9, 51/10（1999年），頁32-47, 19-23；後收氏著：《中國古代北疆史の考古學的研究》（福岡：中國書店，2000年），頁267-299。中譯文見《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地域性及變遷》，收《岱海考古（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454-481。

¹² 林澧：《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收氏著：《林澧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69。（原刊《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2合期）

¹³ 烏恩：《試論漢代匈奴與鮮卑遺址的區別》，收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六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136-150；《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90年4期，頁409-437。

¹⁴ 田廣金：《匈奴墓葬的類型和年代》，《內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頁8-17。

聯境內的「匈奴墓」來做比對研究的論文¹⁵。

第三，論者先將某一草原文化遺址定為匈奴遺址，之後若再發現與此類似的遺址，便一律歸屬於匈奴。在如此類推之下，於是內蒙古地區便出現多個所謂的「匈奴墓」。但一開始被定為「匈奴墓」的遺址是否就是匈奴墓？實際上其證據與論證還是稍嫌薄弱，主要是當時在北方草原地帶活動的古代遊牧民族其實不只匈奴一種，而其墓葬族屬的結論也常有推測大於論證之嫌。

譬如說，就考古報告發表的時間而言，遼寧省西豐縣的西岔溝古墓群是第一個正式被冠上「匈奴文化」的考古遺址¹⁶。但西岔溝古墓群的族屬到底是不是匈奴？在當時即存有爭議¹⁷。而且眾所周知，北方草原民族在文化上的同質性一向高於異質性，因此一旦該類型的墓葬族屬不是匈奴，那麼其後與此類似的墓葬也都無法強歸為「匈奴墓」。Nicola Di Cosmo 即認為「原匈奴」(Proto-Xiongnu)文化的這種提法應該被避免¹⁸。中國匈奴考古中一個重要的盲點是許多未經正式發掘的墓葬出土物或收集物，在沒有經過例如葬式、墓室結構，其他伴隨出土物的整體比較研究下，便冒然的被歸為「匈奴遺物」。然而此種未經精準判定的所謂「匈奴」遺物，竟又成為日後一些新發掘墓葬族屬判定時的重要依據。

這裡有兩個可以討論的例子：一個是發表於 1978 年的「寧夏固原縣出土文物」¹⁹，研究者先以匈奴遺物的名稱發表，但後來發覺不妥，另外撰文更正原先的看法，認為應與匈奴無涉，而較有可能是義渠的文化遺存。首先，雖然該地出土器物的形制和風格與所謂「匈奴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仍可找出不少具該

¹⁵ 幸而最近已發現一篇這類的作品，參見喬 梁：《匈奴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收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編：《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66-489。

¹⁶ 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 年 8、9 合期，頁 25-32。

¹⁷ 參見曾 庸：遼寧西岔溝古墓群為烏桓文化遺跡論，《考古》1961 年 6 期，頁 334-336；孫守道：再論「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文化內涵、族屬及國別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 年 1、2 合期，頁 142-144。

¹⁸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91. 該文簡介參見李海榮：《中國前帝國時期的北部邊疆》一文介評，《北方文物》2002 年 2 期，頁 80-86。田廣金先生先前曾主張過「先匈奴」或「早期匈奴」的概念，參氏著：近年來內蒙古地區的匈奴考古，《考古學報》1983 年 1 期，頁 19。

¹⁹ 鍾 侃：寧夏固原現出土文物，《文物》1978 年 12 期，頁 86-90。

地區性特點的文物；其次該地在商末至戰國晚期並非是匈奴的活動地，匈奴進入該地活動甚至要遲至漢初，作者特別強調：

只看到考古文化面貌上所表現的相同一面，而對歷史記載不認真加以考察，把甘肅、寧夏、陝西北部以及內蒙古及其以北廣大地區所發現的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都統統看成“匈奴文化”，把上述地區一律劃入春秋、戰國時期匈奴族的活動範圍，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²⁰。

另一個例子是發表於 1993 年的 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²¹。若單從出土器物，特別是青銅武器、飾物的形制來看，幾乎與之前所謂「匈奴墓」的出土物非常類似。至於其斷代，墓葬早期相當於春秋末至戰國早期，晚期屬於戰國晚期²²。若不考慮其他的因素，僅從出土青銅器、斷代來判定族屬（這是之前幾個所謂「匈奴墓」經常使用的判定依據），該墓葬其實有相當高的機率會被判定為匈奴墓。但是可幸的是發掘報告者還是採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

楊郎墓地雖然也出土了大量“北方系青銅器”，但它獨特的葬俗與隨葬品，如頭低足高的土洞墓、大型青銅車具、製作精細的骨質車馬器，均罕見於典型的匈奴文化遺存。所以，楊郎墓地雖屬於北方系青銅文化，但不能等同於匈奴文化，而應是北方系青銅文化中另有淵源的土著文化。²³

所以對於經常沒有伴隨文字出土的古代游牧民族墓葬而言，在考古報告中持保留的態度應是比較理想的作法。

4-4-3 對大陸考古界所謂「匈奴墓」族屬推定的分析與檢討

²⁰ 鍾 侃、韓孔樂：寧夏南部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收《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頁 203-213。

²¹ 寧夏文物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93 年 1 期，頁 13-55。

²² 寧夏文物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頁 53。

²³ 寧夏文物研究所、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頁 54。

附表是自 1957 年至 1992 年大陸方面所發表的二十一個所謂的「匈奴墓」，本文依據目前所公佈的考古報告，特別就其「斷代」、「族屬」兩項的斷定依據，作一分析。從附表中，有幾個現象值得注意：

第一，在斷代的時間上，落在戰國中期以前的計有桃紅巴拉、毛慶溝第一、二期、隆德縣匈奴文物與伊金霍洛旗等四處遺址。一如前述，匈奴之名出現於史籍是在戰國中期以後，將在此之前的墓葬族屬全都歸屬於匈奴，是否有推斷過當的問題？遊牧民族墓葬中若未出土可供判定族屬的文字，至少也應符合時間與地域的基本要求。不管年代而僅依據地域相同與器物類似，便驟然地對族屬下定論，其推斷是頗令人未安的。

以隆德縣匈奴文物的斷代方式為例，其斷代被認為是戰國中、早期，而斷代之依據是：（1）葬俗與出土之羊、鹿飾文物同玉隆太墓類似。（2）三稜帶翼鏃和牌飾與毛慶溝類似。（3）車馬飾與寧夏固原匈奴墓類似。（4）銅斧與桃紅巴拉一致²⁴。但若檢視其依據的材料，可發現玉隆太墓出土的鹿、羊飾物依據報告者的推斷是屬於漢代²⁵，但竟可成為其推斷為戰國中、早期的依據，至於是哪些葬俗類似亦未言明。在三稜帶翼鏃方面，依據毛慶溝的考古報告其斷代分為四組，有三稜帶翼鏃出土的是第一組與第二組，第一組的斷代是春秋晚期或稍早，第二組是戰國早期（牌飾屬此組）。車馬飾部分所比對的寧夏固原匈奴墓，原報告者後來推翻之前的論點，認為其非匈奴墓²⁶。銅斧所比對的桃紅巴拉墓，其出土的青銅武器皆被推定戰國早期或稍早²⁷。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斷代應訂為戰國早期或稍早可能或更為恰當。

第二，在斷代方式上，以碳 14、文字或錢幣等較可靠方法來斷定的僅有 8 例：即西岔溝、趙家房村、上孫家寨、西溝畔（1-3 號墓）、西溝畔（5-12 號墓）、毛慶溝第一與第四期、倒墩子、李家套子。除此之外，斷代的方式主要是以器物形

²⁴ 王全甲：隆德縣出土的匈奴文物，《考古與文物》1990 年 2 期，頁 5-7。

²⁵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 年 2 期，頁 111-114。

²⁶ 鍾侃、韓孔樂：寧夏南部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頁 203-213。

²⁷ 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 年 1 期，頁 140。

制比對的方式來進行。其中部分的斷代依據是同中原地區的類似器物作比對，在早期遊牧民族墓葬普遍缺乏文字的情況下，這種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不過也有不少墓葬的斷代，是透過同樣沒有可靠斷代依據的墓葬所比對出來的²⁸，這就比較容易出現站在推測的基礎點上再去推測的情況。如此一來，萬一之前依據的墓葬若發生斷代或族屬上的錯誤，便會連帶的否定另外一批以此為據的墓葬族屬或斷代的判定。

所以，根據上述的原則，我們再重新審視表列的 21 個所謂「匈奴墓」，便可發現若依第一項原則，則桃紅巴拉、毛慶溝第一、二期、隆德縣匈奴文物、伊金霍洛旗等墓葬應該先排除在匈奴墓之列。如再考慮第二項原則，速機溝窖穴的所謂「匈奴」遺物是與準格爾旗瓦爾吐溝出土器物比較而來，但瓦爾吐溝似未見正式發掘報告，其斷代所據不明。固原西郊公社的出土物，是透過與西岔溝與桃紅巴拉比對，然兩者年代差距頗大（桃紅巴拉斷代在戰國早期以前，西岔溝在西漢），何以能斷代在戰國實令人費解。楊郎公社的情況也是透過類似的比對，故其適當性都值得考慮。而毛慶溝的情況也類似，第二組出土器物與北辛堡、鄭家窪子、范家窯子相比對，北辛堡的斷代在戰國早期²⁹，鄭家窪子的斷代在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³⁰，范家窯子的斷代不甚明確，只說是在戰國時期³¹，第三組則只同玉隆太和西溝畔比較，且年代定在戰國中期。因此，前述的速機溝窖穴、固原西郊公社、楊郎公社、毛慶溝等墓葬，也應自所謂「匈奴墓」中排除。故若單從斷代問題來看，扣除以上所列斷代過早或斷代模糊不明的幾個墓葬，可以列入進一步考慮的所謂「匈奴墓」剩下 14 座（即二蘭虎溝、西岔溝、范家窯子、趙家房村、玉隆太、上孫家寨、阿魯柴登、西溝畔戰國墓、西溝畔漢代墓、呼魯斯太、補洞溝、神木縣、倒墩子、李家套子）。其實林滄先生的看法更為嚴格，他認可較確定的匈奴遺存，僅有上孫家寨、倒墩子、西溝畔漢代墓、補洞溝四例³²。

²⁸ 羅豐先生在分析甘、寧地區的春秋戰國時期北方青銅文化時，曾注意到這種年代比定問題的推測性，但其他的匈奴考古研究者似未特別留意到這一點。參羅豐：《以隴山為中心甘寧地區春秋戰國時期北方青銅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 年 1-2 合期，頁 32。

²⁹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懷來北辛堡戰國墓》，《考古》1966 年 5 期，頁 242。

³⁰ 瀋陽故宮博物館等：《瀋陽鄭家窪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年 1 期，頁 154。

³¹ 李逸有：《內蒙古和林格爾現出土的銅器》，《文物》1959 年 6 期，頁 79。

³² 林滄：《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頁 381-383。

第三，在族屬的判定上，部分大陸考古學者對匈奴墓的族屬判定，是依循「出土器物類似（特別是青銅器）即等於族屬相同」這樣一個思考邏輯。但在草原遊牧民族的墓葬中，是否應考慮到：至少從西元前八世紀開始，任何在動物紋飾流行區域內某地的技術與觀念的發明，都很容易傳佈到這區域內的其他地區³³。一種新器物的發明，只要遊牧民族認為實用，或符合他們流行的審美概念，便很容易流行於廣大的草原地區。因此即使年代與匈奴活動的時間相符，若不考慮其他的比較因素（如墓葬形制、葬俗的差異、遺骨人種等），單從器物形制相同就遽下結論認為二者等同的話，是頗值得商榷的。王明珂先生曾指出：

雖然在青銅器的器形及動物紋飾上有相同、相似或傳承發展的關係，但以人群的經濟生態來說，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使用此種青銅器的人群可能有相當大的差別。³⁴

民族誌的資料顯示，用同樣陶器的人可能屬於不同的族群。從考古材料中，我們很難知道哪一種是古人用來表明自己族群身分的文化特徵。同一族群的活動。在考古上可能留下不同的文化特徵。不同文化特徵所界定的人群，常成一個個重疊而又不完全相合的圈子，它們與民族邊界往往不相符合。因此，器物風格並不能表現一個古代族群的範圍以及他們的族源。³⁵

因此以強調青銅器的類似性來歸納出墓葬的族屬的做法，其實應當更加謹慎。因為考古研究者心中的「典型」匈奴器物，是不是真的就是匈奴人平日習用的器物形制，在沒有伴隨文字出土物（即能證明使用者為匈奴）的情況下，似乎無法得到確切的證實。

第四、大陸考古發掘報告者的比對方式尚有以下傾向：以疑似匈奴的考古遺址 E 墓葬為例，該墓葬的出土遺物通常是部分相似於 A 墓，部分類似於 B 墓，部分像 C 墓，部分等同於 D 墓，而因為 A、B、C、D 四個墓葬先前都已被判定為匈奴墓（甚至有些還未被認為是匈奴墓）的緣故，所以 E 墓葬也理所當然的被

³³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頁 411。

³⁴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頁 403。

³⁵ 王明珂：《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頁 67、70、81。

斷定為匈奴墓。但是 A、B、C、D 四個墓葬的內容形式是否完全或大部分相同？可能並非如此，他們彼此間在葬式、葬俗與出土器物上，仍存有某種程度的差異性³⁶，遺憾的是有部分大陸研究匈奴考古的學者往往忽視了這個部分，甚至還有一種「使用鄂爾多斯青銅器³⁷者即是匈奴」³⁸的論點出現。

此處僅以呼魯斯太匈奴墓為例來做說明。依據其考古報告³⁹，其被斷為匈奴墓的理由是：（1）所出土的銅鶴嘴斧、銅刀、銅鑄等銅飾與桃紅巴拉相同。（2）三稜帶翼銅鏃與玉隆太、毛慶溝匈奴墓類似。（3）鹿形牌飾造型與速機溝、西溝畔之角鹿造型一致。（4）陶器的肩部飾以波浪紋或三角紋帶，是匈奴陶器上普遍流行之作風。因此，與呼魯斯太匈奴墓作對比的所謂「匈奴」墓葬共有五個（桃紅巴拉、玉隆太、毛慶溝、速機溝、西溝畔）。先看斷代，桃紅巴拉的斷代上限為戰國早期或稍早，下限為不晚於西漢⁴⁰；玉隆太為「戰國至漢代」⁴¹；毛慶溝分斷代分為四期：第一組相當於春秋晚期或稍早；第二組相當戰國早期；第三組相當戰國中期；第四組相當戰國晚期⁴²。速機溝則斷在漢代⁴³；西溝畔則在戰國晚期⁴⁴。先從斷代來看，其比對之對象橫跨春秋晚期至漢代，在長達四百餘年的時空中，活動於該地區的民族是否有其延續性？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再來看墓葬形式，呼魯斯太匈奴墓的葬式為豎穴土坑墓，南北向，墓主頭向北。與此葬式相同的有西溝畔、桃紅巴拉，但毛慶溝雖同為豎穴土坑墓，但大部分是東西向，頭朝東。玉隆太對葬式並無說明，但提到葬俗大約與桃紅巴拉類似，速機溝則完全無說明，可見在葬式方面並無完全一致的現象。烏恩先生曾提示過：鄂爾

³⁶ 宮本一夫：《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地域性及變遷》，收《岱海考古（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454-481。

³⁷ 關於「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一詞的提出，在方法上也存在著問題，參見羅豐：《以隴山為中心甘寧地區春秋戰國時期北方青銅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合期，頁46；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史語所集刊》第65本第2分（1994年），頁402-403。

³⁸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文物》1992年5期，頁81。

³⁹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北京），頁11-12。

⁴⁰ 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頁140。

⁴¹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頁114。

⁴²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收田廣金、郭素新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299-302。

⁴³ 蓋山林：《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速機溝出土一批銅器》，《文物》1965年2期，頁45。

⁴⁴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頁10。

多斯和陰山南麓的匈奴墓葬之間存在著某些如墓葬方向、殉牲、馬具、隨葬飾件、陶罐上的差異，這類問題在中國域外的「匈奴墓」也有反映，外貝加爾湖和蒙古境內的匈奴墓之結構，與中國北方匈奴墓便有所不同。外貝加爾湖和蒙古境內的匈奴墓地面往往有石堆，有些四周還圍以石塊，有的墓底用石塊奠基，中國境內的匈奴墓地面均無任何標誌，墓內亦未見圍砌石塊的現象⁴⁵。再來看銅鏃的部分。經比對後，可發現呼魯斯太的銅鏃（圖1）⁴⁶與玉隆太（圖2）⁴⁷或毛慶溝（圖3）⁴⁸雖同為三鏃翼，但造型仍有差距。呼魯斯太銅鏃的鏃翼較長，玉隆太與毛慶溝則偏短，呼魯斯太的銅鏃造型反倒是接近中原及東北地區西周與春秋中、早期的二鏃翼銅鏃形制。而玉隆太與毛慶溝的三鏃翼的形制，事實上更接近春秋晚期瀋陽鄭家洼子、河北懷來北辛堡的造型（圖4）⁴⁹。至於鹿形牌飾一致性的說法，也值得商榷，因為所描繪的看似皆為糜鹿之類的長角鹿類，雖可歸為風格類似，然也可能僅是一種寫實。最後提到的陶罐，強調的是紋路的類似，但若從外型來觀察，可發現其三者實有顯著的差異（參圖5、6、7）。故在看似諸「同」之中仍有「異」的存在，若只擷取「同」的部分而忽略「異」的部分，所得出的結論是否應客觀？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根據此種族屬判定法而被定為匈奴墓的墓葬非常多，如趙家房村、玉隆太、西溝畔戰國墓、西溝畔漢代墓、補洞溝、神木縣、倒墩子、李家套子等，都是依據這樣的思維而被斷為匈奴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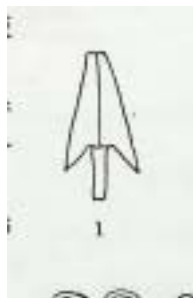


圖1 呼魯斯太墓之銅鏃

摘自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頁11。

⁴⁵ 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414、424-425。

⁴⁶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頁11。

⁴⁷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頁113。

⁴⁸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頁263。

⁴⁹ 林澐：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收氏著：《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19。（原刊《考古學報》1980年2合期）



圖 2 玉隆太墓之銅鏃

摘自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 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 ，頁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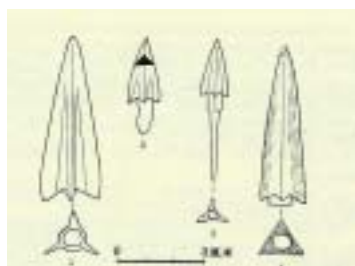


圖 3 毛慶溝墓之銅鏃

摘自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 毛慶溝墓地 ，頁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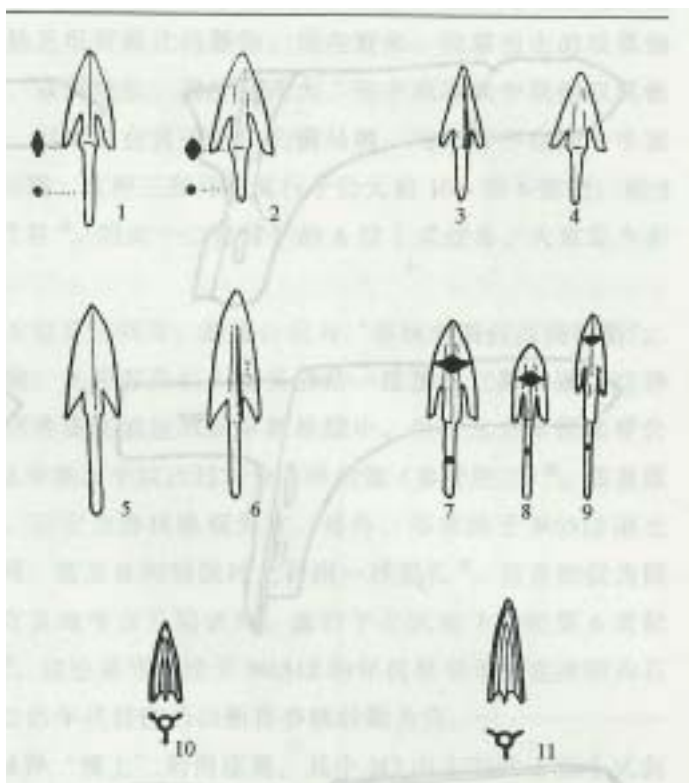


圖 4 東北及中原地區之銅鏃：春秋初期以前（上排） 春秋中期（中排） 春秋晚期（下排）

摘自 林澧： 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 ，頁 319。



圖 5 呼魯斯太匈奴墓陶罐

摘自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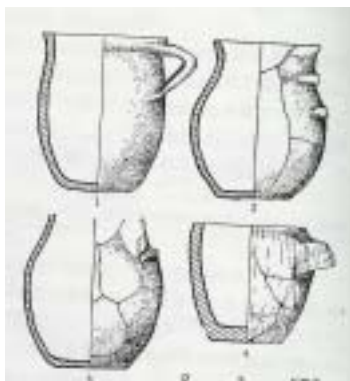


圖 6 桃紅巴拉的匈奴墓陶罐

摘自 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頁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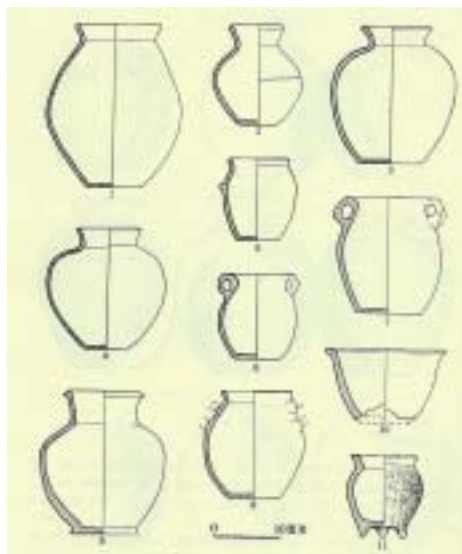


圖 7 毛慶溝陶罐

摘自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頁 256。

第五，這些墓葬的族屬判定還有以下這樣的問題：即便是斷代符合匈奴活動的時間，在地域上仍然不能排除該地同時還有其他非匈奴民族活動的可能性⁵⁰。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在遼西地區有東胡系的鮮卑、烏桓，在鄂爾多斯附近有林胡、樓煩以及「保塞蠻夷」⁵¹，在寧夏附近也有義渠活動。根據文獻記載，他們的生活方式可能都與匈奴非常類似⁵²，使用器物應有相當大的一致性，雖然在後來這些民族部分被併入了匈奴，但在冒頓崛起之前，甚至在匈奴統治之下或是匈奴衰弱之際，他們都並非可以完全等同於匈奴。二蘭虎溝、西岔溝、范家窯子、阿魯柴登等墓葬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⁵³。

4-4-4 北方草原地區匈奴考古應考慮有其他族屬的可能性

一如前表所分析，在許多被定為匈奴遺址的發掘報告中，其實有不少都缺乏類似寧夏楊郎墓地等在出土器物外及斷代外，還有其他像是墓葬形制、葬俗等全面性的比對。當然這應與墓葬發掘當時的保存情況，以及發掘者當時的研究設計（即發掘關心之重點）有關。然而不可諱言的，以這種類似不完整發掘的情況或僅是搜集部分的出土文物而言，驟然的以「匈奴墓」為名對外發表，其適當性是堪疑的。因為它的確還存在著其他族屬的可能性，也容易誤導日後類似考古遺址的族屬判定工作。

大陸的考古工作曾被西方學者批評為具有明顯的編年證史傾向⁵⁴，考古發現

⁵⁰ 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西元初幾世紀東歐地區的早期遊牧民族考古族屬認定上。在二十世紀初，人們將匈人和阿瓦爾人的墓葬混同，後來又把匈人墓葬誤認為是薩馬泰人的墓葬。目前對匈人、阿蘭人和哥德人遺址的辨認仍存有失誤。參見邁克勞斯 艾爾迪 著，賈衣肯 譯：從北方蠻人（公元前八世紀）和匈奴墓葬看古代匈牙利人的喪葬習俗，《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3期，頁40。

⁵¹ 《史記 孝文本紀》：「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頁425）。

⁵² 《漢書 晁錯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⁵³ 以西岔溝為例，就有四種不同的族屬說法。參見曾庸：遼寧西豐西岔溝古墓群為烏桓文化遺跡論，《考古》1961年6期，頁334-336。孫守道：再論「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文化內涵、族屬及國別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合期，頁142-144。

⁵⁴ 如羅泰 貝格利等都曾發出過批評。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經常都「應在已有的歷史知識中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這樣一個前提下展開」⁵⁵，「研究者已被引導到去相信他們早已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考古學的目標僅僅是去闡明一種已被接受觀點的正確性」⁵⁶。貝格利更反對任何在沒有文字作為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將考古遺存與特定歷史群體相聯繫的努力⁵⁷。在年代早於文獻上匈奴出現時間的墓葬中，不能否認其中可能部分的確是匈奴先民所留下的遺址，但這並不代表北方草原地帶所有戰國中期之前的墓葬全屬於匈奴先民。研究哪些是匈奴的墓葬，並不能單從器物的比對來作為判斷的主要依據，其他器物以外的因素（如相當重要的墓葬形制）在匈奴考古中不應被忽略。大陸匈奴考古學者目前對墓葬器物比對的興趣，似高過於對葬式的比對興趣，這也是大陸地區匈奴考古的另一項缺失⁵⁸。固然，將考古發掘成果與古籍中的民族做比定，是地域考古學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⁵⁹，但這種考古遺址族屬的比定，在缺乏文字的情況下進行時是否應該更為謹慎，而且器物的比對在斷代的問題上確有其功用，但並不適合拿來作為判定族屬的唯一依據。

內蒙古地區的匈奴墓似乎數量不少，但春秋至戰國中期在此地區活動的主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67, no.257 (1993), pp.839-849. 中譯文參見陳淳譯：論中國考古學的編史傾向，《文物季刊》1995年2期，頁83-89；Robert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op.cit, pp.124-231. 另外，對「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同樣也有人批評，見谷中信一著，張青松譯：新出土資料的發現與疑古主義的走向，《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2001年1期，頁128-133。

⁵⁵ Robert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op.cit, p.124. 另參見唐際根：考古學、證史傾向、民族主義，《讀書》2002年1期，頁42-51。

⁵⁶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67, no.257 (1993), p.846.

⁵⁷ 唐際根：考古學、證史傾向、民族主義，頁47。

⁵⁸ 較早似僅有烏恩先生之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所幸最近已有大陸考古學者再度投入這一類的工作，參楊建華：東周時期北方系青銅文化墓葬習俗比較，收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邊疆考古研究》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56-169；目前對此著力的尚有日本學者有小田木治太郎的中國北方「青銅文化」の墓——戰國時代前後の内蒙古中南部および寧夏周邊，收金關恕先生的古稀をお祝いする會編集：《宗教と考古學》（東京：勉誠社，1997年），頁437-471；三宅俊彦：《中國古代北方系青銅器文化の研究》（東京：國學院大學大學院，1999年）。宋遠茹的鄂爾多斯周邊及中原地區的漢代匈奴文化分析（《考古與文物》2001年6期，頁75-80。）一文也是同性質的作品，但深度稍嫌不足。

⁵⁹ 宮本一夫：中國古代北疆史の再構築，《中國古代北疆史の考古學的研究》（福岡：中國書店，2000年），頁310。

角「戎」、「狄」，卻反倒沒有留下什麼重要的遺址，這是相當令人不解的。若說在春秋至戰國中期的這段期間此區只有匈奴的活動，而義渠、赤狄、長狄、白狄、林胡、樓煩等族似乎從未在此區活動過，恐怕是較難令人接受的⁶⁰，何況義渠、赤狄、長狄、白狄、林胡、樓煩等族也不盡然全等同於匈奴。但是我們若仔細閱讀這些所謂「匈奴墓」的出土報告，卻不難發現有部分著名的匈奴考古學者，所持的竟是此種看法。而它們的這種看法，又順理成章地成為學者書寫匈奴相關研究論文的考古學依據。儘管部分發掘者後來已意識到這些問題，承認這些考古遺址有可能與戎狄⁶¹、狄人、林胡、樓煩有關，但他們仍將林胡等北狄系民族與匈奴之間畫上等號，而進一步將在鄂爾多斯所發現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遺物，稱之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⁶²，若我們考慮到中國先秦北疆民族的複雜性時，就很容易可以明瞭這種簡單的化約方式依然有欠妥當，這一點 Nicola Di Cosmo 已論之甚明⁶³。李海榮先生也指出：北方地區多為騎馬游牧或半游牧性的國族，流動性很強。因此，欲準確地講明任何一個時期的任何地區所活動的古代國族，或任何一只考古學文化所屬的國族，就目前來看是很困難的⁶⁴。

本文的目的，只是想凸顯大陸的匈奴考古工作者在發表他們對疑似匈奴墓葬族屬的看法時，態度是否應該更加的謹慎。最近林澐先生提出新的分類法，將長城地帶春秋晚期到戰國時代的北方民族遺存分為六區，並指出期間的差異性，論證了長城地帶的這些北方民族考古文化，是既有共同因素又各有特點的多種文化，不是同一族源在文化上分化所致，而是不同族源的人群各自創造而又互相滲透的結果⁶⁵。宮本一夫也提出分布在隴山地區、鄂爾多斯高原、河套地區、涼城地區、燕山地區持北方式青銅器的考古遺址，應是白狄系統的義渠（隴山地區）、林胡（鄂爾多斯高原、河套地區）、樓煩（涼城地區）、鮮虞、肥（燕山地區）等民族所遺留的看法⁶⁶。李海榮先生新出的專著⁶⁷也有更細緻的區域性分類，同樣

⁶⁰ 就筆者所見，以上述諸族名稱發表的考古遺址僅有支配勇、高平如：平魯井坪樓煩墓，《文物季刊》1992年1期，頁20-23，44。

⁶¹ 郭素新：再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期，頁95-96。

⁶²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197-199。

⁶³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op.cit., p.891.

⁶⁴ 李海榮：《北方地區出土夏商周時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頁95。

⁶⁵ 林澐：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頁369-377。

⁶⁶ 宮本一夫：中國古代北疆史の再構築，頁316-318。

都是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作法。較之先前部分大陸考古報告者的思維，這樣的分類似乎更為適切一些。而且當戰國末期，生活在鄂爾多斯之南、長城以北的混合經濟人群逐漸消時，被拒在長城的人群首先是凝聚為樓煩、林胡等部落集團⁶⁸，他們被併入匈奴是在稍晚的時期。因此將戰國末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墓葬皆視為是匈奴墓，是有欠妥當的。

「匈奴」一詞出現於古代中國文獻的時間似不早於戰國中期⁶⁹，確切一點的說，若依《史記·匈奴列傳》的記錄，匈奴名稱的出現是在趙武靈王以降⁷⁰，戰國以前不見匈奴與中原發生任何關係，而且載籍所見之匈奴在戰國晚期僅與趙、燕、秦發生關係⁷¹。在此之前北方戎狄的狀況是「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⁷²。匈奴一詞此時的出現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北方戎狄中有一支稱為「匈奴」或族名與「匈」字發音相近的部落逐漸強大起來，最後成為北方戎狄的通稱（即通行的王國維說）；另一種可能性是「匈奴」一詞純係外來語，為一新侵入中國北方之外來民族族名。故將戰國中期之前甚至春秋時期的北方草原民族墓葬都列入匈奴墓，似非科學的態度。Nicola Di Cosmo 也指出：「明確的匈奴文化在中國北部的出現通常被斷定在公元前四世紀末。西方學者將此歸結於中亞游牧民族的遷徙。相反地，《史記》則把匈奴當作是古代北方民族的後裔。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一般說來是強調連續和逐漸發展的觀點，中國學者堅持匈奴的起源和發展是在北部中國本土的游牧文化中」⁷³。

春秋至戰國中期以前的北方草原民族墓葬族屬問題，目前存有兩種可能：一是王國維式的解釋，他們是匈奴的前身，後來在戰國中期以後他們有了一個新的稱號名曰匈奴（無論是自稱或他稱）。當然王國維的主張有其一定的文獻考察基礎，同一系統的民族或在時空存續上承襲同一文化的社會集團，其名稱確有可

⁶⁷ 李海榮：《北方地區出土夏商周時期青銅器研究》。

⁶⁸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史語所集刊》第 65 本第 2 分（1994 年），頁 417。

⁶⁹ 孫次舟：《匈奴出現中國邊塞的時代》，《西北通訊》第 3 期（1947 年），頁 9-11。

⁷⁰ 宮本一夫：《中國古代北疆史の再構築》，頁 314。

⁷¹ 黃盛璋：《獫狁新考》，《社會科學戰線》1983 年 2 期，頁 146。

⁷² 《史記·匈奴列傳》，頁 2883。

⁷³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p.888.

能會隨世異名的情況出現⁷⁴，但若將所有的考古材料都一律依王國維的論點去思考甚或強加解釋，未免難脫削足適履之嫌。另一種解釋則是：這些墓葬的主人與匈奴也許無直接的承繼關係，他們與匈奴之間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⁷⁵。況且現在大陸考古報告中所謂匈奴墓的分布地點，有許多是在秦漢時期的「新秦中」（即大致為蒙恬所占領的「河南地」）地區，這一帶的民族不只有林胡、樓煩、義渠而已，據史載還有一些族類不明的「保塞蠻夷」，而他們應與匈奴不同⁷⁶，下迄西漢，至少在漢文帝時「保塞蠻夷」仍為漢朝守塞⁷⁷。不僅如此，作為先秦古族之一的「貉」族，其居地原在中國北方⁷⁸。貉疑為游牧民族，然其俗亦有農耕⁷⁹，《孟子 告子篇 白圭章》云：「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⁸⁰有些所謂匈奴墓中曾有穀物出土，或許墓葬主人當為貉而非匈奴或未可知。因此先秦時期活動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少數民族，便至少有胡（匈奴）、貉、林胡、樓煩、義渠以及保塞蠻夷等數種，族類可謂龐雜，通歸之為匈奴或匈奴前身，似未盡妥。當然上述北疆諸族在血統上難免或有混雜的情形，這些墓葬族屬的民族最後成為日後南匈奴人民的主體，或許不能排除目前發掘的所謂「匈奴墓」，其實有不少都是這些被併入匈奴的貉、林胡、樓煩、義渠以及保塞蠻夷所遺留下來的。在中亞的游牧民族考古也有相同的問題，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中亞，早期游牧民族留下來的土冢墓（Kurgan，庫爾干）何止成千上萬。遺留這種土冢墓的早期游牧民族之中有塞人，薩爾馬特人，斯基泰人，馬薩格特人，月氏，烏孫等等。這些民族有的彼此有親緣關係，有的極可能是古代不同地區的歷史家給予同一個系屬的部落的不同稱謂。實際上，中亞早期不同游牧民族的墓葬的局限

⁷⁴ 宮本一夫：《中國古代北疆史の再構築》，頁 314。

⁷⁵ 譬如羅豐先生已指出：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應屬於緄戎系統，戰國時期才被併入匈奴集團，成為渾邪王部。參羅豐：《以隴山為中心甘寧地區春秋戰國時期北方青銅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 年 1-2 合期，頁 39、42。

⁷⁶ 史念海：《新秦中考》，收傅杰 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史考據文錄（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150-1151。（原載《河山集》第五集）有關貉族的討論，已見於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⁷⁷ 《史記 匈奴列傳》：「至孝文帝初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頁 2895），另參管東貴師：《漢代的屯田與開邊》，《史語所集刊》第 45 本第 1 分（1973 年，台北），頁 45-46。

⁷⁸ 凌純聲：《松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研院史語所，1934 年），頁 28-29。顧頡剛：《句注北之并、代》，《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頁 5142。

⁷⁹ 林占鰲：《貉》，《禹貢半月刊》第 7 卷第 5 期（1937 年），頁 7-10。

⁸⁰ 《孟子 告子篇 白圭章》，頁 221。

並不易於劃清⁸¹，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草原游牧民族墓葬問題應更為複雜，因為中國古代文獻中提到的北方民族名稱比中亞多，其鑑別度又更形困難。林澐先生曾提示：文獻記載的北方諸族（如代、義渠、烏氏）和文獻不一定曾記載過的族團（如毛慶溝、崞縣窯子等遺存所代表的族團），在人種和文化特徵上彼此相異，不能把他們混在一起，或在不同族稱之間任意化等號。也不能簡單地把漢代匈奴聯盟曾佔據地域的所有前期居民都當成匈奴的祖先。即使在匈奴聯盟建立後，文化的一致性進一步加強了（如陶器形式也走向一致），聯盟內的各部族仍有考古學上可以辨認的各自傳統特點⁸²。相較而言，前蘇聯學者使用過的「早期游牧人」⁸³一詞，或者「古代北方民族」，可能比用「匈奴」來稱呼這些北方民族墓葬來的恰當。

總之，本文認為大陸考古學者所發表的所謂「匈奴墓」，其數目範圍應比現在更為縮小，而考古報告對於墓葬族屬的推測過程也應更為謹慎。基本上對「匈奴」葬墓族屬的爭議來自於對「匈奴」一詞認知的不同。角田文衛曾分析「匈奴」一詞有三種概念：一是作為北狄的總稱的「匈奴」；二是指從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後三世紀威震蒙疆，征服東胡、月氏、丁零等族，以「百蠻之長」君臨其他民族的「匈奴」；三是指包含匈奴國家內所有臣屬異民族的「匈奴」，如《史記 匈奴列傳》冒頓單于寫給漢文帝的書信中所言：「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⁸⁴，若從此種分類法來看，顯然大陸某些考古工作者所採取的是第一種或第三種較為廣義的匈奴，而本文則較強調第二種，即不包含如東胡、樓煩、白羊河南王等屬於「別部」一類的部族，將焦點集中在匈奴之主體民族。一如前述，本文認為在未有明確文字可確定族屬的情況下，採取保守匈奴概念可能是較妥當的作法。

⁸¹ 黃振華、張廣達：《蘇聯的烏孫考古情況簡述》，收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99。

⁸² 林澐：《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頁383-384。

⁸³ C.C.車爾尼科夫：《關於“早期游牧人”一語》，《考古》1961年5期，頁277-280。

⁸⁴ 角田文衛：《フン族と匈奴——その人種の歸屬をめぐって》，收氏著：《增補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新時代社，1971年），頁280-281。

1957-1994 年內蒙古及其鄰近地區發現的「所謂匈奴墓」一覽表

編號	遺址發佈名稱	地點	發掘報告發表時間	發掘或搜集時間	斷代時間	斷代依據	族屬判定為匈奴之依據	問題點	依據文獻	備考
1	二蘭虎溝古墓群	內蒙察哈爾右翼後旗	1957 年	1952 、1956 年	東漢	出土有漢式銅鏡、銅鈴和繩紋灰陶罐等漢代中原器物。	1.銅罐、牌飾。 2.斷代在東漢。	似未經正式挖掘，且即使是東漢，該地在不同時間之居民未必相同，不能排除像是鮮卑、烏桓等族所遺留。	孫守道：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匈奴和漢代文物，《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 4 期，頁 29 32。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編：《內蒙古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頁 5。	
2	西岔溝文化古墓群	遼寧省西豐縣	1960 年	1956 年	漢武帝至昭帝	貨幣、銅鏡、陶器	該地在當時歸匈奴左地管轄。	該地雖屬匈奴管轄，但並不意味著居住於該地者為匈奴人。	孫守道： ”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 年 8 9 合期，頁 25 32。	
3	范家窯子墓葬	內蒙烏藍察布盟和林格爾縣	1963 年	1958 年	戰國時期	並存有中原戰國式長胡四穿銅戈。	因斷代在戰國時期。	未言明是戰國早、中、晚那一期。蓋戰國早、晚期當地居民可能有很大不同。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編：《內蒙古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頁 5 李逸有：內蒙古和林格爾現出土的銅器，《文物》1959 年 6 期，頁 79。	
4	速機溝窖穴銅器	內蒙伊克昭盟	1965 年	1962 年徵集	漢代	與準格爾旗瓦爾吐溝出土銅器近似。	1.漢代時鄂爾多斯草原的居民是匈奴人。 2.出土銅器具游牧色彩。	瓦爾吐溝出土銅器似未有正式報告，不知其斷為漢代所據為何？	蓋山林：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速機勾出土一批銅器，《文物》1965 年 2 期，頁 44-45。	
5	桃紅巴拉匈奴墓	內蒙伊克昭盟杭錦旗	1976 年	1973 年	戰國	以青銅短劍形制類似和林格爾范家窯子和	1.由戰國到漢武帝期間，活動於伊盟沙漠草原	1.斷代在戰國早期或更早，但當時文獻中	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	

	匈奴墓	盟杭錦旗			早期或稍早	河北懷來北辛堡一號墓出土銅劍	地帶的應是匈奴族。 2.出土青銅器物形制與東北地區有別。	尚未出現匈奴，且斷代依據不甚明確。 2.出土器物形制不同於東北地區，並不代表文化主人即是匈奴，族屬歸為赤狄或白狄似乎更為適當。	1976 年 1 期，頁 131-143	
6	趙家房村匈奴墓群	內蒙察右後旗	1977 年	1969 年	漢代	漢式鏡、五銖錢	出土物與二蘭虎溝匈奴墓類似。	因推斷僅是與二藍虎溝遺址比對的結果，故族屬之問題仍可商榷。	蓋山林：內蒙古察右後旗趙家房村發現匈奴墓群，《考古》1977 年 2 期，頁 139-141。	
7	玉隆太匈奴墓	內蒙準格爾旗	1977 年	1975 年	戰國至漢代	1.所出土的盤角羊飾與西安出土的秦代盤角羊飾類似。 2.三棱型鐵鋌銅鏃是戰國至漢代普遍流行的型式。	1.葬俗與器物部分與桃紅巴拉匈奴墓類似。 2.出土銅飾與二蘭虎溝、速機溝等地出土物類似。	其判定依據是與桃紅巴拉匈奴墓、二藍虎溝、速機溝等比對的結果，但此三者是否為匈奴墓，本身就存在著疑問。	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 年 2 期，頁 111-114。	
8	固原西郊公社	寧夏固原	1978 年	1973 年	戰國時期	出土器物與西岔溝及桃紅巴拉相似	因與左列二者相似	西岔溝及桃紅巴拉墓葬之族屬本身就存有爭議。	鍾侃：寧夏固原出土文物，《文物》1977 年 12 期，頁 86-90。	
9	固原楊郎公社	寧夏固原	1978 年	1976 年	戰國至漢代	出土銅牌與和林格爾、土默特旗、察右後旗、遼寧西豐銅牌相似。	因與左列者相似	左列者之族屬仍有疑義。	鍾侃：寧夏固原出土文物，《文物》1977 年 12 期，頁 86-90。	
10	上孫家寨匈奴墓	青海大通縣	1979 年	1977 年	東漢晚期	墓室結構、銅鏡、五銖錢	出土“和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一枚，透雕牌飾。	墓葬族屬有匈奴與盧水胡二說。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 年 4 期，頁 49-53。青海省文物考古所：《上孫家寨漢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頁	此墓為現今中國境內所發現的匈奴墓中，唯一有文字出

									217-220。	土佐證者。
11	阿魯柴登匈奴遺物	內蒙伊克昭盟	1980 年	1973 年	戰國時期	1.該墓附近有一戰國時期遺址。 2.出土物與玉隆太、西溝畔、毛慶溝、西岔溝、桃紅巴拉出土遺物相似。3.動物造型與巴澤雷克出土遺物相似。	報告認為玉隆太、西溝畔當屬林胡一支，而阿魯柴登屬於白羊王或林胡王。	在報告者眼中，戰國時期的林胡等同於匈奴。	田廣金、郭素新：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匈奴遺物，《考古》1980 年 4 期，頁 333-338、364、368。	
12	西溝畔戰國匈奴墓（1-3 號墓）	內蒙準格爾旗	1980 年	1979 年	戰國晚期秦統一六國之前	金銀器上的刻款字體為戰國字體。	1.短劍、銅刀、帶扣等與桃紅巴拉、范家窯子、毛慶溝、玉隆太、北辛堡等出土者類似。 2.動物紋飾物與阿魯柴登、玉隆太、速機溝、瓦爾吐溝、呼魯斯太相同。	純粹以器物比對為基準來判定，而類比對象則是之前的幾個所謂「匈奴墓」。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 年 7 期，頁 1-10。	
13	呼魯斯太匈奴墓	內蒙烏拉特中後聯合旗	1980 年	1979 年	戰國	1.車馬器銅鈴與寧夏固原出土之戰國秦鈴相同。 2.葬俗與桃紅巴拉相似。	出土銅器與西溝畔、玉隆太、速機溝、桃紅巴拉、毛慶溝相似。	也是採用比對的方式來斷定。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 年 7 期，頁 11-12。	
14	西溝畔漢代匈奴墓地（4-12 號墓）	內蒙準格爾旗	1981 年	1980 年	1.西漢初期（4 號墓） 2.西漢初期或稍晚（5-12 號墓）	1.出土牌飾與瓦爾吐溝相似；隨葬帶飾與桃紅巴拉、玉隆太、毛慶溝等相同。 2.玉佩之舞人造型與漢初相似。 3.從出土瓷的漢字作風觀察。	出土陶罐與諾音烏拉補洞溝相似（小口細頸瘦腹罐，肩部裝飾波浪曲線紋、近陶罐底部有穿孔）。		伊克昭盟文物站：西溝畔漢代匈奴墓地調查記，《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第 1 期（創刊號），頁 15-27。	
15	補洞溝匈奴墓	內蒙伊克昭盟	1981 年	1980 年	西漢末至東漢初	發現相當數量的漢式文物，如馬蹄形鐵鼎和規矩鏡。	1.葬俗與桃紅巴拉、玉隆太、西溝畔、呼魯斯太匈奴墓相似。 2.隨葬器物分別與諾音	札賚諾爾墓葬的族屬問題仍存爭議。	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補洞溝匈奴墓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第	

							烏拉(陶罐) 二蘭虎溝、札賚諾爾(鐵鍬) 毛慶溝(鐵帶飾) 相似。		1 期(創刊號), 頁 27-34。	
16	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	陝西神木縣	1983 年	1957 年(納林高兔)、1982 年(李家畔、老龍池、馬家蓋溝、中溝)	1. 春秋末年或戰國早期(老龍池)。 2. 戰國晚期(納林兔、李家畔)。 3. 秦漢之際(馬家蓋溝、中溝)。	1. 出土短劍與范家窯子、北辛堡相似;帶扣與桃紅巴拉、西溝畔相似;銅泡與玉隆太相似。 2. 出土文物之動物造型與西溝畔、阿魯柴登、玉隆太相似;短劍與呼魯斯太相似;帶扣與桃紅巴拉、西溝畔、玉隆太相似。 3. 銅斧與二蘭虎溝、補洞溝相似。	1. 出土文物均屬鄂爾多斯式青銅器。 2. 葬俗與桃紅巴拉一樣。 3. 神木縣屬當時匈奴活動地域。	斷代依據與其他墓葬比對而來,而該地當時尚有可能是義渠的活動地區,而非僅是匈奴而已。	戴應新、孫嘉祥: 山西神木現出吐匈奴文物,《文物》1983 年 12 期,頁 23-30。戴應新: 納林高兔匈奴文物出土略記,《故宮文物月刊》第 12 卷第 12 期(1995 年), 頁 118-127。	
17	毛慶溝墓地	內蒙烏蘭察布盟涼城縣	1986 年	1979 年	1. 第一組相當於春秋晚期或稍早。 2. 第二組相當戰國早期。 3. 第三組相當戰國中期。 4. 第四組相當戰國晚期。	1. 第一、四組有碳 14 年代測定。 2. 第二組由銅劍、帶扣和銅鏃之形制與北辛堡、鄭家窪子、范家窯子接近。 3. 第三組帶扣與玉隆太接近。	第一期屬於某一支狄人的文化。依《史記》記載推定第二、三、四期可能與樓煩有關。	此墓葬族屬在出土報告中被認為是狄人或樓煩,本應屬較保守之推定,但此墓葬還是常被拿來當作是典型的匈奴墓,而往往被視為是斷定其他疑似匈奴墓的重要判定依據。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 毛慶溝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頁 227-315。	
18	倒墩子匈奴墓	寧夏同心縣	1987、1988 年	1985 年	西漢中晚期	出土之五銖錢與滿城漢墓相同。	1. 隨葬陶器為漢代「匈奴墓」具有特徵性的器物,類似形制在外蒙 外貝加爾湖「匈奴墓」中亦有出土。 2. 漢代安定郡屬國都尉	當地亦有義渠居住,故不一定就必然是匈奴,而且墓葬形制還出現了其他所謂「匈奴墓」所罕見的偏洞室墓,發掘報告也承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 寧夏同心縣倒墩子漢代匈奴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7 年 1 期, 頁 33-37。寧夏文物考古	

							治三水縣,即在今同心縣一帶,故有可能族屬為降漢之匈奴人。	認大概是受西北地區其他少數民族葬俗的影響。	研究所 等: 寧夏同心 倒墩子 匈奴墓地,《考古學報》1988年3期,頁333-355。	
19	李家套子匈奴墓	寧夏同心縣	1988 年	1983 年	東漢早期	因出土有新莽幣「貨泉」	1..出土之透雕牌飾與銅環與西岔溝及倒墩子相似。 2.出土「匈奴式」陶罐。 3.同心縣即當漢之三水屬國都尉範圍。	以地望來看,同心縣所在與傳統義渠活動地域亦接近,不能排除該墓葬是義渠後裔的可能性。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寧夏同心縣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報告,《考古與文物》1988年3期,頁17-20	
20	隆德縣匈奴文物	寧夏隆德縣	1990 年	1984 年	戰國中期或早期	出土器物與玉隆太、毛慶溝、桃紅巴拉、寧夏固原等墓葬出土物相似。	認為前表所列之遺址皆為匈奴墓葬。	全係靠器物比對來界定族屬,其邏輯是器物相似等同於族屬相同。	王全甲: 隆德縣出土的匈奴文物,《考古與文物》1990年2期,頁5-7。	
21	伊金霍洛旗匈奴墓	內蒙伊金霍洛旗	1992 年	1988 年	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	出土器物形制與寧夏、甘肅、內蒙寧城南山根、水澗溝、北京等地春秋戰國之交墓葬出土器物相似。	殉馬習俗與鄂爾多斯及鄰近地區的所謂「匈奴墓」相同,銅飾、銅刀及生產工具表現出典型的鄂爾多斯式青銅文化因素。	僅由殉馬及具有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特徵,即斷定為匈奴遺存似嫌粗糙。其邏輯是使鄂爾多斯式青銅器者即為匈奴。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文物》1992年5期,頁79-81。	

小 結

身體上的一些表徵（頭髮、相貌、服飾），常常可以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來標示族群之間的身份異同，而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徵。此亦為族群識別時的一項重要指標，身體的表徵裡其實隱藏著區隔與認同。在胡、漢的區別意識之中，身體的表徵意義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不論胡人是否與漢人在種族外貌上存在著區別，凸顯異民族間視覺印象上的不同，強調身體表徵所暗指的文化意涵，是漢人區隔胡、漢，並凸顯漢人是文明的、尊貴的一種重要途徑。

本章探討了漢代對胡人的種族形象問題，並嘗試對匈奴人的種族爭議做出看法。第一節中，本文提出即使胡漢在種族上並無截然不同的差別，但塑造民族之間形象上的「異類性」，是有助於一般人民透過視覺的直接方式，輕易地做出族群之間異同的判別。特別在一個較高的文化中，一個建制完善的審美價值系統常導致種族典型化的產生¹。塑造他者形象的「異類性」甚至「怪誕性」，有助於漢代人民排斥異民族的心理需求，也再度肯定了漢人在種族與文化上所保有的尊貴性與優越性。第二節中，本文分析漢代文獻中所反應的「胡狀」問題。區分或指出異民族所具有的另類身體表徵，是民族識別時常使用的一種方式。漢代留下了一些凸顯異民族身體容貌特徵的文字敘述，顯示漢人已注意到民族之間存有體質上的差異。透過文獻分析，可發現漢代人民應存有胡人形貌與漢人不同的認知。而這種不同點究係為何？漢代文獻並未清楚言明，但參照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胡狀描述，恐怕這種不同還是類似於黃、白之隔的人種特徵。第三節本文進一步探討了匈奴的人種問題。一如第二章所述，漢代的胡人主要指的是匈奴人與西域人，作為胡人重要指涉對象的匈奴，其人種歸屬迄今仍是一項爭議的論題。透過考古文物與體質人類學報告的觀察，本文認為匈奴的人種應是屬於一種高加索種與蒙古人種不同程度的混血類型，而此種類型在現今的突厥系民族中表現最為明顯。匈奴人的人種成分複雜，但因曾混有高加索種之故，有的黃種人特徵強些，有的

¹ 馮 客 (Frank Dikötter) 著、楊立華 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頁 37。

則表現出較多的高加索種特徵，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才会有「最胡狀」的用詞出現。針對中國境內的匈奴體質人類學材料，表現出與外蒙古或南西伯利亞、中亞等地區不同的問題，本文認為形成此種差異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因為中國境內的匈奴的確是屬於蒙古人種，但也有可能與匈奴墓認定的問題有關。大陸的匈奴考古報告確實存在著一些方法論上值得商榷之處，在第四節中即針對部分大陸匈奴考古學者的研究方法提出質疑。因為游牧民族的墓葬普遍缺乏文字，其同質性又常大於異質性，因此在墓葬族屬問題的斷定上（即是不是應命名為匈奴墓），本文建議應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

